



“反面教员”

梁漱溟

FANMIAN JIAOYUAN  
LIANGSHUMING

汪东林 著



# “反面教员”梁漱溟

FANMIAN JIAOYUAN  
LIANGSHUMING

“反面教员” 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

在反右斗争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语

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1964年：梁漱溟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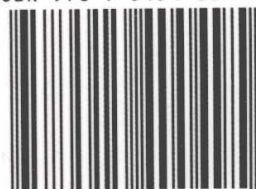
梁漱溟与赵朴初

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的晚年生活

建议上架：历史文化类

ISBN 978-7-5154-0049-5



9 787515 400495 >

定价：28.00元



“反面教员”  
梁漱溟

汪东林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面教员”梁漱溟/汪东林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4-0049-5

I. ①反… II. ①汪… III. ①梁漱溟(1893~1988)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125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立旭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周 浩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mailto: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印张 插图 42 幅 12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 （代序）

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

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吗？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

（选自费孝通先生1987年10月31日

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 目录



##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代序）

### 一、“反面教员”梁漱溟 /1

小汽车的门一开，他就下来了……他是小个子，还戴了个瓜皮帽……/1953年9月，梁漱溟从毛泽东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反面教员”。没过多久，汪东林就见识到了这个“反面教员”的厉害。/梁漱溟说：毛泽东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我要休息，我要安静。”这是梁漱溟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 二、梁漱溟与毛泽东 /22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梁漱溟长谈……/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梁漱溟说：“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的错误。”

###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 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 /56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陈



铭枢站起来说：“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 / 李济深和张澜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的过错。

#### 四、在反右斗争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语 /64

梁漱溟特别赞赏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两段话，他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好，好得不能再好！” / 梁漱溟感觉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学术味不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 / “在 1957 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

#### 五、梁漱溟 1958 年向党交心 /68

梁漱溟发言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说到交心，好象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真实的情况。” / “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 “……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 六、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86

“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





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 / 梁漱溟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招来了批判，但他仍然不赞同用阶级斗争一个道理来说明一切的立论。 / 对毫不切题的批判，梁漱溟不予理睬。在政协学习委员会上，他做了长达八千字的答辩。

### 七、1964年：梁漱溟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106

梁漱溟说：我缺欠的是在阶级问题上缺乏阶级感情……我缺乏阶级感情有其特殊的由来。 / “由于我没有真懂阶级，在解放后犯了许多错误。” / “深思细想之后，恍然大悟毛主席真懂阶级，而我则口里会说阶级，并没有真懂阶级。”

### 八、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126

1965年7月，梁漱溟在政协直属组上只字不提阶级斗争。他说，建国15年的成就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科学之事，道德之事。 / “我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脾气。” / “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我对毛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这一点。”

### 九、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137

梁漱溟在“文革”初期说：搞了多年的革命，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如何解释？ / 闯进梁漱溟家的红卫兵烧梁漱溟的《辞海》、《辞源》，梁漱溟感到可悲、可怜。 / 梁漱溟打开电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写作《儒佛异



同论》。/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 十、梁漱溟与赵朴初 /161

1974年批林批孔时的一次政协直属学习组会议上，梁漱溟讲了两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次日，赵朴初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赵朴初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赵朴初说：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

## 十一、梁漱溟与冯友兰 /168

1973年冯友兰署名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文章，梁漱溟对此十分不满，从此中断同冯友兰的联系，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责此事。但在公开场合，却始终给冯友兰先生留足了“面子”。/“批林批孔”运动结束约两年之后，梁漱溟先生翻阅旧札，检出冯友兰先生六十余年前写给他的一封长信，重读一遍，看后不胜感慨，在信末空白处写下一段话，回忆他与冯先生的交往，同时也责冯“竟以批孔鸣于时。”



## 十二、梁漱溟的晚年生活 /172

梁漱溟出示一张八十多年前的照片，风趣地说：“前排正中坐者是我，实际年龄至少十岁，看上去却只有六七岁的模样。” / 梁漱溟说：“要说养生，我的经验可总结为：在生活上少吃多动，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气贵平和，情贵淡泊。” / 94岁的梁漱溟被评为“健康老人”。

附录一：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183

附录二：蔡元培破格任用梁漱溟 /197

后 记 /202

增订本后记 /206

## 一、“反面教员”梁漱溟<sup>①</sup>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放前曾将教育救国视为己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解放后，他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毛泽东请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1953年，在与毛泽东的一场争论之后，他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此后的二十几年中，一直有一个无形的帽子叫做“反面教员”。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曾接受过采访，谈到梁漱溟的一些情况。我与梁漱溟相识是20世纪60年代我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

1962年秋，笔者开始在全国政协工作，在政协直属学习组中担任秘书。60年代来这个学习组学习的，大多是一些没有实际职务的政协委员，他们中有溥仪、溥杰这样的末代皇帝和皇族，也有宋希濂、杜聿明这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于树德、王芸生等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共同的学习任务，是改造自己的思想。笔者的工作，是记录这些组员在学习组里的言行。即将开始工作的时候，领导专门找笔者谈话，说马上要有一个“顽固的反动分子”

---

<sup>①</sup> 2005年4月，汪东林先生应邀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采访。本节系在凤凰电视台播出节目内容基础上整理而成。



◎1982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部分政协委员与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起：黄维、赵君劭、溥杰、程思远、梁漱溟、秦德君、董竹君、何柱国。后排右一是宋伟斌；右四起：张西洛、马璧、杜建时、刘亚哲、米哲沉、沈醉。

来参加学习。

笔者：领导问我，你知道梁漱溟这个人吗？我说我知道，我上大学时就知道他的名字。然后领导说：这个人啊，是少有的顽固不化，不光是他解放前就反共，解放以后呢，共产党对他不错，毛主席对他也不错，但是呢，他居然就是当面、大庭广众地反对毛主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句话我还记得。他好几年不来了，既然来了，他肯定就要说话，要反动，所以你要特别留意他。他要讲话的话，你一定要非常认真地记。

几天之后，笔者见到了梁漱溟。

笔者：小汽车的门一开，他就下来了，下来就拎这么个布包，他就这么个包，我记得，里面可能装的笔记本什么，走得很快。走上台阶就看见我们这些人啊，他瞟了一眼，就进了屋子。第一个印象，他是个小个子，还戴了个瓜皮帽，当时并没有穿长袍，穿的像是中山服，挺贴身的中山服。

那时笔者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会和这个反动分子成为忘年之交。笔者所记录的梁漱溟在学习组中的言行，后来成为他写作《梁漱溟问答录》

一书的原始材料。梁漱溟一生没有写作自己的传记，这本书是梁漱溟对自己一生的口述历史，也是梁漱溟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别人吐露自己成为反面教员的经过。

## 梁漱溟与毛泽东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聘用，成为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梁漱溟在北大讲授佛学和儒学。1921年，梁漱溟写作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治世救国的主张。

**笔者：**梁漱溟最早时候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学说，他写过小册子，叫《社会主义粹言》，但是他没有完全相信，没有相信它，后来相信儒家这个学说了。可是呢，有几个人对他影响很大，首先是他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李大钊。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相投的，一直到李大钊牺牲，他为李大钊收尸。陈独秀他也认识，他一直认为共产党这些领导人，都是为国为民的一条一条汉子，是想把中国搞好。他说对他们这些人，他是很敬重的。



©1923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留影。

梁漱溟后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

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的距离。而思想上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态度。梁漱溟认为以武力求统一，只能再延迟中国的统一。他希望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求救国的良方。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的教职，从此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从1931年初开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儒家学说改造风俗，希望能够实现中华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时留影。

文化自下而上的复兴。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儒家活动。那时梁漱溟踌躇满志，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笔者：**他这一套的形成啊，是继承了中国，现在叫知识分子，过去叫士大夫吧。把自己的事情啊，是置之度外的。总是从年轻开始，就考虑国家、民族怎么办，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做法来做这件事情。北大教授那个待遇是很高的。但他一定要走出去，自己出去，留都留不住。他就感觉到这个教育也好，要改造中国也好，要跟农村，跟农民相结合，把这个整套的中国文化带到农村去，搞乡村建设。尽管他搞这个东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可是日本人来了，全都吹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乡村建设成



©1936年，梁漱溟与他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在济南留影。

为空谈，梁漱溟的梦想全部破灭。心灰意冷的同时，梁漱溟想到延安去看一看。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隆重接待。

**笔者：**一见面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说，梁先生，20年前，我就见过你好多面了，不过你可能不记得我。他说是吗？毛泽东就给他讲了，他说那个时候啊，他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岳父是杨怀中，我住在杨怀中家，你经常去，我给你开门，梁漱溟就想起来了。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梁漱溟是北大著名的讲师，毛泽东是寄人篱下，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1938年，梁漱溟是为团结抗敌而四处奔走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时梁漱溟对中国的未来几乎绝望，担心中国会在日本的侵略下亡国。是毛泽东打消了梁漱溟的顾虑。



笔者：第一天，一直到凌晨，主要谈抗战的问题，梁漱溟很佩服毛泽东。一开始，梁漱溟对抗战很失望。他也是个文人嘛，文化人，他说，中国看还有没有救？毛泽东就把还没发表的《论持久战》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告诉了他，中国最后要必胜的。谈完，梁漱溟对毛泽东说，抗战这么些年，从这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这么个情况，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像你说的这样子使我也有点信心。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在第一天谈话的最后，梁漱溟将自己写作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送给了毛泽东。

笔者：第二天晚上，通宵达旦谈这个问题。毛泽东看了梁漱溟的书，还批了好多好多字，两个人就发生争论了。毛泽东就说，你这是改良主义，这是教育救国，这个走的是改良的路子，中国必须要搞阶级斗争，那就包括



◎1934年，从事乡村工作的若干团体领导人及专家学者合影。自左起，（前）于树德、晏阳初、高践四、陈筑山、严敬斋、魏朗斋、章元善、梁漱溟。（后）张鸿钧、瞿菊农、孙则让、李景汉、梁仲华、杨开道、许任廉。

武装斗争，就是枪对枪，兵对兵，武装夺取政权。你离开这个东西，我不同意，你反对这个东西，这是不行的。梁漱溟并不服，就跟他争那个。他说，我认为你这个不行。这个打仗，从民国时代开始，打那么些年，也没有打出个名堂来。再说中国这个阶级，不像外国那个阶级，不分明，贫富不分明。这是二人的分歧所在。两个人观点就不一样，那么，就互相辩论。毛泽东态度非常非常好，所以两个人到了最后，即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还跟他说，咱们的争论啊，就到此，咱们且听下回分解，看将来吧，就这样子，各自保留意见。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使他终生难忘的，是辩论时毛泽东的风貌和气度。“他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这次会面之后，梁漱溟曾在1946年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再赴延安，调停国共内战，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梁漱溟就此辞去民盟的职务，隐居重庆，教书修佛。1949年，和谈空气又起，梁漱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篇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文章。

**笔者：**梁漱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敬告国民党》，还有一篇是《敬告共产党》，他是两边都那个。那篇《敬告国民党》就说这个内战是你们弄起头的，你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对共产党呢，他就说，还是和谈吧，不要再打了，打了死人会更多。

梁漱溟坦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他依然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学说持怀疑态度。但是他的言论和文章，当时中共没有任何反应。不久之后，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梁漱溟与老百姓一起，在重庆迎接解放军进城。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离开重庆，奔赴北京。

**笔者：**在北京头一次和毛泽东见面谈话，毛主席就讲：梁先生，这回可以参加我们政府了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他想了半天，才说，我这

个人还是放在政府外面更好吧。他不干，这一下子就把毛主席碰了一下子。他说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个人要到政府去做事，不合适，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感觉到当时毛泽东脸色不好看。

梁漱溟说，直到这时，他仍然担心全国的大局不会就此稳定统一。又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思想。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请梁漱溟长谈，又安排他到各地去参观，还让他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在参观的过程中，梁漱溟改变了看法。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他诚恳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自己从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肤浅了”。此后两年，梁漱溟开始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但是他的意见，总和毛泽东的观点有所冲突。

笔者：他说我要搞自己的东西，搞这个传统文化，搞这个咱们中国文化。几次跟毛主席讲，毛主席就把他压下来，推推推推。实际上毛主席不同意他搞，他心想，你一搞起来，还不是孔孟之道，还是讲那些东西吗，他没同意他。还有一个就是抗美援朝，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紧张，内战刚刚结束，怎么跟美国人打仗呢。毛主席专门派人征求梁漱溟的意见，梁漱溟说，最好别打。

## “反面教员”

1953年9月，梁漱溟从毛泽东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反面教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笔者：《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面有篇文章，后来把它抽掉了，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除了说梁反动，是野心家，伪君子，蒋介石用刀杀人，梁以笔杀人，这个人一辈子没做过好事这些话；还说，你总是以为你自己美，你比王昭君也美，你比西施还美。我是看了以后很吃惊，毛主席非常非常生气了，情绪失控了，已经不是在跟梁漱溟争论问题了，差不多直接就等于是骂梁漱溟了。而且《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只有毛主席怎么怎么说，恰恰没有梁漱溟怎么怎么说的，一句话也没有。

“文革”之后，梁漱溟向笔者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周恩来给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征求政协委员的意见。9月11日，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梁漱溟作了一个即席发言。

笔者：梁漱溟发言最重的话就是：进城后，这个工人有工会管，生活提高了；工商界人士有工商联；农会呢，搞了土改，就不用了。干部都进了城了，农村空虚了。农民苦，农民想进城，你不让进，又把他轰回去。我还听别人讲，说是工人生活提高太快了，农民还是那么苦，所以有“九天九地”之说。最重就是“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差得太大了。就这么个话。梁漱溟说，这个样子是不行的，可别忘了，共产党是靠农民进城的，你那么做，人家会说你嫌弃人家了，你领导党这样合适吗？他说的就是这么个话。其实他就是提出这个农民问题。

当时没有人对梁漱溟的发言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人表示赞同。第二天，政协扩大会议转为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一个发言，发言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毛泽东又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

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破坏的。”这个发言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

**笔者：**梁漱溟一听，较劲了。梁漱溟说，你说的就是我。因为他的发言很多人都听过的，他很不服。他说，因为毛主席说他反对总路线，反对工农联盟，他要辩驳。他给毛主席写信，毛泽东约他见面。二人谈20分钟，吵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感觉到你就是反对总路线和工农联盟吗？毛主席说他这个，他不干，他说我要申辩。

梁漱溟申辩说，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但是在9月17日，周恩来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为了做官、一贯反动”。这种批判的调子激怒了梁漱溟。梁漱溟要求再次申辩，并且说，自己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异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需要给他更充裕的时间。大会于是决定要梁漱溟在9月18日发言。

那一天，梁漱溟走进会场的时候，发现到会的人比前几天多了几乎一倍。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

**笔者：**这么一弄之后，梁漱溟坚决不认输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让他滚下来也好，讲什么，他都不管。他就盯着毛主席，他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就是，这个政协委员下一届我还可以提名你当，这个雅量有。梁漱溟就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毛泽东说，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说的了。

梁漱溟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这是很正经的面对面那么说的。其他毛主席的那些话，如，说梁是杀人犯，伪君子，野心家，比西施什么什么还美等，那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批评发言的时候，他插话的。梁漱溟坐在那边不吭声，但是梁漱溟坚持，我必须答辩，你们说吧，反正最后我都要答辩。毛主席始终说，你讲短一点。他说，我短讲不了，你们讲了好几天，我短怎么讲得清楚？就吵。

于是，大会陷入了僵持状态，梁漱溟在主席台上，用沉默与毛泽东对峙。

笔者：这时有人提出来，说付诸表决，看看赞成他讲下去的多，还是不赞成他讲的人多。毛主席还特别说了一句，说这个事不是中央政府会议的议程，大家都可以举手，包括列席的民主党派所有人都可以举手的嘛。主持会议的是高岗。毛泽东主席带头举手赞同他讲。这是个戏剧性很强的场面，他带头举手，然后其他中共一些领导人都举手，都同意。但是这个会呢，中共人少，在台上的人多，在台下的人不多。高岗说不同意的人举手，哗，台下的就举手，人多。毛主席就说，这还是不同意的人多啊。高岗就对梁漱溟说，你的话，这里不讲了，你就到别的地方再辩论，再讲去。然后台下喊，滚下来，滚下来。梁漱溟只好滚下去了。

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但“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这就是梁漱溟“反面教员”称号的来历。

在1953年9月当众顶撞了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反面教员”的称号也不胫而走。梁漱溟可以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但是主要工作变成了检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对于来自毛泽东的批判，梁漱溟选择沉默。不久之后，梁漱溟向政协请了长假，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他提出，要

用更多的时间，在家中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笔者：**他就说我这次闯了大祸，我这个人有问题，但梁漱溟从来没有检讨他的“九天九地”有什么错。他在事后感觉到，我不应该这样冒犯他，他是个领袖，不是延安时期的那个毛泽东。

1956年9月，闭门思过的梁漱溟从报纸上得知了中共八大召开的消息。八大宣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他期盼中国能掀起一个新的经济建设高潮，但是1957年初，接踵而来的，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

**笔者：**他以为共产党搞整风啊，是让这个民主党派大家开会，更多的是提这个领导党应该怎么怎么领导，搞建设，搞这个。后来他看报纸，觉得更多的是提这个共产党作风啊，官僚主义啊，这些东西，看来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时也号召搞这个东西，他就很纳闷，不解。因为不解，他就不说话。他一句话没说，当然就不好给他戴帽子，又不能把1953年的再戴一次。所以梁漱溟这个人物很怪的，他当那么多年“反面教员”，被说成是“茅坑里的石头”，但是他从来没有戴过正式的政治帽子的。

因为沉默，梁漱溟平安度过了反右派运动。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很快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宣传。此时，梁漱溟结束了自己的闭门思过，开始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参加学习。

**笔者：**开始好长时间，六二年，六三年，他没有作什么长篇发言。但是他有个特点，很认真，学东西很认真，听人家讲也很认真，而且他不旷课，不无故请假，一板一眼的。但是他没发言。

但是没过多久，笔者就见识到了这个“反面教员”的厉害。

**笔者：**因为六四年那个时候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家都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几乎所有的发言都说，我们国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梁漱溟他心里不同意这个，所以他就作了准备，写了稿子，很长的，讲起来也得起码要两个小时吧。他把这个解放以后的15年的成就，归功于两句话，一句话叫科学之事，一句话叫道德之事。科学之事，他说是因为我们解放以后搞成的建设，主要讲建设成就，是因为顺应了科学才取得，我们如果不顺应科学的话，就取不得。那么什么叫道德之事呢？这个道德就是说，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旧中国是一盘散沙，什么东西都抓不起来，解放以后，因为共产党领导得法，所以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出来了。这个发挥出来就不得了，这是取得这个成绩的第二大原因。现在，我讲给你这么一听，好像这话也没什么错，是不是？听起来，他没有讲别的。但是他唯独没有提一个，即阶级斗争一个字他都没说。

因此，梁漱溟的发言就引起了一场大批判，历时几个月。笔者发现，梁漱溟不作任何检讨，学习组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也不了了之。

**笔者：**梁漱溟曾经对发生“文革”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讲了自己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顾不上批判他。他认为，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看来，不但是“三家村”的问题，看起来，就是这个彭真也有问题。彭真那时候还没有被点名批判，彭罗陆杨还没有弄出来。他说我真是不理解，我想了好多天，看了好多好多文章，都没用，都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

1966年，梁漱溟73岁。这一年8月，红卫兵关了政协的门，学习组也停止了学习。不久之后，一群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

**笔者：**红卫兵烧他的书、字画，凡带字且认为是“四旧”的都烧。他



一直想讲话，找不到机会。突然一个红卫兵把那本《辞海》拿出来烧，很厚的《辞海》，不好烧。梁漱溟当时就说，小同学们，其实他当时岁数很大了，那时候都叫红卫兵小将，但是他的脑子还转不过来，说小同学们，别的都烧了，这本书别烧，因为这是工具书，都用得着的，再说的话，是我学生借给我的，烧了可惜，你就留给我，好还他。红卫兵挺有意思，他说，你这个老反动，我们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行了，还要《辞海》有什么用啊。梁漱溟就不吭声了，他们倒上香油把《辞海》烧掉了。

自抄家那天起，红卫兵就正式“占领”了梁漱溟的家，并且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梁漱溟后来说，面对“文革”的汹涌风暴，自己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不解，所以梁漱溟写信去请教毛泽东“文革”的意义所在。但是这封信，没有回音。

## “文革”岁月

“文革”中，红卫兵烧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画，同时给了梁漱溟一叠白纸，命令他不许自由行动，老老实实交代一生的反动罪行。但是梁漱溟把这叠白纸用作了其他用途。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记忆，梁漱溟写作了四万字的《儒佛异同论》，然后又接着写出了《东方学术概观》。就这样，他度过了“文革”最初四年的生活。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梁漱溟所在的学习组恢复学习，梁漱溟又重新出现在学习组。不久之后，传来了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消息。

这时，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组为四

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笔者：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非常害怕，没有一个人敢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梁漱溟开始没吭声，到最后了，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他说征求我们的意见，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会，好久不开会了，咱们一点意见都提不出来，好像我们这个政协委员有个脸面问题，意思就是水平问题。他说，我想我还是要点意见。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

他说我这个人，对这个法，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这个了。我看过英国的法，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法，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宪法有欠缺，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拿林彪来说。林彪那个时候并没有出事，在台上，他还并不知道林彪有什么错误。他说总纲上还写着接班人林彪。哎，我声明，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不能有，中国可以有，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第二条意见，说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也不好。一国总应该有个元首，我们原来宪法就有国家主席，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没有元首；国家主席还是要，应该要，谁当，谁来当，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完以后啊，当时会场上情绪，鸦雀无声，情绪紧张，你看我，我看你。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那个时候时兴这个话。

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

采取了应急措施。

**笔者：**于树德说，他这个话，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别讲，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他就说了这话。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受批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上边有电话通知的，那就是总理办公室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意思吧，说某某人思想反动，利用这个机会放毒，不要纠缠，不要跟他纠缠。这样，这个事就放下来了。

1971年9月，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也没有再提起。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此后不久，《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了梁漱溟。

**笔者：**因为他是个儒家，所以一开始搞批林批孔的时候，他没吭声。别人说，他一句话也不说。别人问他，他说不是我不说，我一说出来，跟时下这个运动有碍。别人劝他说，你只要批林批孔就好。他一笑，说，我说的是批林批孔这个内容，但是我跟你们说得不一样。结果大家一定让他说，最后他接受了，他说，好，你让我说，可以，你得给我时间。给多长时间，问问他，他说你给我两个半天时间，我讲。

1974年2月24日，是梁漱溟发言的日子。笔者记得，这一天，梁漱溟显得特别郑重。

**笔者：**他那天很特别，把自己的中山装穿得笔挺啊，还拿了一个教授的皮包。因为解放以后他没当过教授，这次好不容易当了一回教授。这个印象，这个细节特有意思的，过去从来没有看到他拿个教授的皮包。他讲得很长的，

批林批孔这个事情，他说是个政治运动，涉及孔子，涉及……克己复礼……

梁漱溟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台下很安静，没有人打断。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过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梁漱溟发言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

**笔者：**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离开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2500年，下启2500年，特别是下启。这样的人物，你说他一无是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梁漱溟如此评价孔子，立刻遭到了质疑。人们追问他对批判林彪的态度。

**笔者：**我认为像林彪这样的人是没有路线的——这是梁漱溟的话。没有路线的。为什么没有路线呢，因为我对路线有个定义。路线，政治路线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民族的公开主张，这个就不管他是对是错都是路线。毛主席有革命路线，大家都在学，都知道。这是梁漱溟原话——说刘少奇，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这也是路线，他都公开讲的。甚至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他也是公开主张的啊。说彭德怀有路线都可以，唯独林彪没有。那林彪没有路线，你怎么批林彪，怎么批啊？他说我说几句话，就是我批林彪啊，林彪不是人，是个鬼，这就够了。

如此一来，梁漱溟又多了一个罪名。替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反党分子辩护。政协批判梁漱溟的运动立刻升级，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批林批孔兼批梁”。

**笔者：**批判嘛，批判力不够，干脆搞大，军代表、统战部和政协军代表组织，搞大，搞成大会，200人大会。大家上台讲，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搞了好长好长时间，差不多一年吧。搞完以后呢，梁漱溟也不检讨，让他检

讨他也不检讨。他说，完就完。他天天洗耳恭听，你怎么说都可以。他还有一个特点，批判中间一休息，他就打太极拳，你怎么批都可以。

梁漱溟的太极拳，从春天打到了冬天。局面就一直僵持。

笔者：到了最后，回到学习组，学习组那个时候有二十来人。在学习组中，王芸生、于树德都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搞了这么久，从4月份到9月份，到秋天了，冬天都快到了，对你自己就没点触动，你就没有想想这个事你是怎么考虑？他不说话。后来几次问他，他说，我说几句话啊，这个孔子有句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是我这个志。我就坚信我的理性，我的理性，我是坚信不移的。你们不管谁，没有充分的一种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不能改变。

这一场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又不了了之。

1974年9月，毛泽东有过一个批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很多人认为，这个批示，隐含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保护之意。80年代，笔者把这个批示告诉了梁漱溟。梁漱溟听后是一种既严肃又欣慰的神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 “文革”之后

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梁漱溟再度陷入沉默。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此后不久，“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也就此结束。对于这些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巨变，梁漱溟始终一言不发。

1978年2月，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上一届政协

议的召开已经有13年之久。梁漱溟打破沉默，第一次针对“文革”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在当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笔者：当时那个会呀，是三中全会没有开，对这个“文化大革命”啊，阶级斗争为纲啊，都没有否定。尽管大家受了“文革”之苦，委员们都痛哭流涕地讲过去的事情啊，“文革”的遭遇啊，毛主席去世，周恩来去世，讲这个事，但是没有人从正面直接对“文革”谈什么。梁漱溟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会上作了个长篇发言。他的中心是围绕着人治法治这个问题讲的，涉及“文化大革命”。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这个“文革”已经结束了，这个大家说得都对，这个都谈了好多事，但是我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在看来，人治应该开始结束了，已经到了要开始法治的时候了。我讲人治，就离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对毛主席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个什么原因呢，如果从人来讲，就是人治，就是毛泽东。

梁漱溟的发言被认定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阶级斗争的故伎重演。大会结束后，很快又开始了一场对梁漱溟的批判。

笔者：但是这一次啊，跟以前的批判不一样了，这次学习组的组员们觉悟比过去高多了，盲从的人很少了，所以批梁越批越没有劲，等于是强弩之末。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结束了近30年挨批的命运，他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笔者：改革开放以后，找梁漱溟的人很多了。采访他的人，特别是海外的，都以为梁漱溟一定对毛泽东非常恼火的，肯定要说他一些坏话什么的，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记者。

但是梁漱溟一直不提个人当年与毛泽东的争执，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往往出乎采访者的意料。

笔者：他说毛泽东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这三个人物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然后就说他有两个看法，一个是他不同意说只有一个毛泽东，有好多个毛泽东，或者叫变化着的毛泽东。那就是说，有早期的，有抗日战争，解放前的毛泽东，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是不一样的，人是变化的。再一个观点就是毛泽东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这两个最，也不是一般讲三七开，或者四六开，也不讲这个事情。他说这两个最大是连在一起的，他功劳最大，他才有可能犯最大的错误，没有那个功劳，谁也搞不了“文化大革命”。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对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老朋友就是这么来看。也常有人说梁漱溟是硬骨头，有骨气，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很有骨气。

在一生的最后岁月，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



◎梁漱溟晚年在家中阅读文件



◎程思远撰稿、沈醉书写的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址碑林题词。

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1988年6月，梁漱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笔者：**他是可以搞透析，还可以再活下去的，健康老人，95岁了，但是他始终不愿意接受，他就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历程，活到95岁，已经很不简单了。那些药，那些先进的东西，那些什么先进的透析等等，给更年轻的人用，不要给他用了。有时候甚至连药都不吃，他把生死看得很淡。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位思想家与世长辞。



## 二、梁漱溟与毛泽东

许多人都知道，1953年9月间，毛泽东主席曾经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梁漱溟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始末，将留在本文的最后加以叙述。现在先要介绍的，是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笔者诚恳地希望，当读者们耐心而饶有兴味地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会实事求是地得出一个结论，即：梁漱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一位身份特殊、作用亦特殊的老朋友！习仲勋同志在《相遇贵相知》第一辑《序》中所说：“交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要同那些刚正不阿，直言无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做朋友。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辨别是非。”如果把这段话用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上，或许是很相宜的。

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



©1916年，梁漱溟（右一）在民国司法部与沈钧儒（右二）、何海秋等合影。

题，彼此逐渐相熟。杨先生对这位二十多岁的哲学爱好者颇为注意和关切。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本人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因此，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便主动登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拜访，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这以后，除了在北京大学有时见面，更多的在杨怀中家，而杨本人，反而很少去梁家了。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不久杨怀中先生不幸病故。因为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蔡校长便出面发动捐款，希望大家资助，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杨家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

脑海中 20 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 1938 年 1 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作彻夜长谈……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 7 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敌，保我中华，同样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时局更紧张了。其时，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由于日本人在卢沟桥扩大了战火，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宣言，全国老百姓所盼望的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已成为事实。作为实际上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人。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

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人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



◎1939年春，梁漱溟自重庆大后方赴敌后巡视，途经皖、苏、豫、鲁、冀、晋等省，历时八个月。巡视途中，常昼伏夜行，露宿风餐，历尽艰险。图为梁漱溟（前排右三）自敌后归来返抵洛阳之日，与河南省同学合影。

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

在毛泽东首先提到 1918 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十分果断而有力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



©1938年1月，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时的合影。

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

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



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十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对笔者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用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

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作为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一时间，由于国共两大党的合作，其他各党各派的努力，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等，几乎都谈

到了。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多党制，想让今后的中国，如同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攻我，我揭你，你不行就我上台，仿佛中国的前途就寄托于欧美式的多党制了。

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他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了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共，想到了毛泽东，能不能到延安去向中共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吧，也可立此存照。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八年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八年前毛泽东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先搭飞机到北平，然后再由北平赴延安。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十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他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他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领导

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就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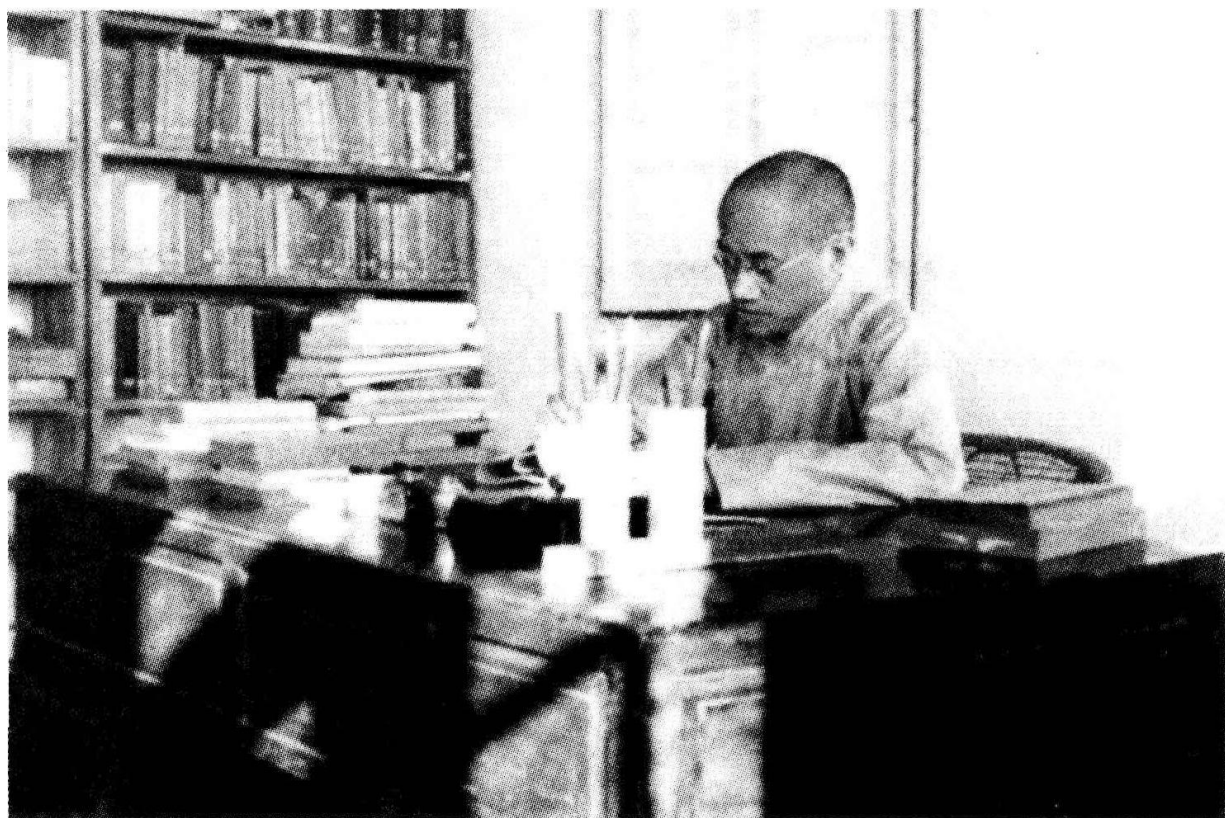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

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却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



◎1948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了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



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报以微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梁漱溟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先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对笔者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先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

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的日子，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主席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主席走到梁的坐席，见梁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家中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毛主席派汽车来到梁漱溟当时居住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接梁，10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毛主席已在院里迎梁了。同在的还有林伯渠，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梁漱溟1938年初赴延安途经西安时即认识林，后来又在重庆旧政协会上交往过多次。

在会客室彼此一番寒暄之后，毛主席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毛主席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最后提出的问题，却难住了梁漱溟。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认为，新中国成立了，但全国的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呢？他有怀疑。梁漱溟想到自己是曾



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国事奔走，而自己要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这就是梁漱溟当时的真实思想，却又不便说出。因此梁漱溟迟疑了片刻，才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说话间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开饭时除毛、梁、林三人外，还多了一个江青。但梁漱溟只同她点点头，彼此没有说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又继续谈话。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接受了毛主席的盛情，于1950年4~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和山东的谭启龙都会见过梁漱溟，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也会见了，并征求梁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毛主席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毛主席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毛主席先吃。于是，

江青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9月间？毛主席同江青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晚饭后主席就转过头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后，主席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主席说：“那也好。”毛主席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二十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主席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主席告辞。章走后，毛主席即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主席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

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说到此，毛主席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主席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

案而起，做出犯颜抗论之举。

## 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这一公案之始末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3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绝不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具有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

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

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同志）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所讲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写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

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征求大家作大会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的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本人的发言。其他小组也采用了这一办法。到会议结束时，大致各小组都汇报完毕。临散会时，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而且那天小组会上几乎全是中共之外的非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在党外广大群众中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到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答复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

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

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上天，农民的生活在下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



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在家中接待来访客人。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在主席台上的中共领导人讲完后，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



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的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

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先生对于自己在这场大波澜中的言行，事后是如何反省，又是如何醒悟的呢？请看他事后即1953年9月底的一段记述：

九月十八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震动，许多至亲好友来规劝我，帮助我。九月二十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这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言语中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



◎1986年重阳节，梁漱溟93岁生日时，与长子梁培宽在紫竹院公园大门外合影。

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宽儿的这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宽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先

生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

我于二十二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

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惜、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如前所说。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勤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

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被蔽而不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犟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犟讲骨气的。我之倔犟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说到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有很久的历史背景。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成长，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或熟人、同事。但我历来对共产党只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这一思想经常在我过去写的若干论著和文章中流露，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主张加以反驳。而我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随着我行动。因为这，每当有左倾的朋友批评我时，自己总不服气，心里想着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我也是革命的！自国民党忘记革命、背叛革命之后，我甚至希望长时间吃苦头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能修改路线，发生转变，与自己走到一起。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今天听起来可笑，但却是我当初存有若干年的真实想法。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



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一九五三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

去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政协方面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久没有下文……

是的，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4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 1953 年历史公案补遗

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在 1988 年第 1 期《文汇月刊》上发表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信询问：从文中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场合里，似乎是一边倒地批判梁漱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梁说一句公道话或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疑问。难道在一二百之众的高层人物中硬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者？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在这里根据事实，略作补遗。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毛泽东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1946 年，梁漱溟（右）与张澜合影。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 1949 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

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

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主席台，注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在 1953 年 9 月 8 日至 18 日前后 10 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应该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李、张二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 9 月 12 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任潮）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 年梁漱溟 29 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李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梁漱溟婚配。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 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

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去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进了一步。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所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济深为老友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出像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的检讨所能奏效的。他们认为，这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出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

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济深与张澜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毛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已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再提这件事。

### 补记：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一段批示

毛泽东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代伟人，梁漱溟是一位集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新儒家的鼻祖。关于他们两人之间半个世纪的交往细情，笔者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中作过记述。我现在要补写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一段批示，这个批示笔者在撰写上述书文时尚未发现，虽然只是点了一下梁漱溟的名字，却很能说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直至晚年——逝世前一年多。在他的思想宝库中，仍然闪烁着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解放前梁漱溟曾两次只身赴延安，为国事与毛泽东见面长谈。解放初期，他们又多次单独见面，交流思想，共商国是，一直到 1953 年 9 月终止。自我撰写的有关梁漱溟的书、文发表以后，常有一些年轻的读者问我，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几十年的交情，就因为 1953 年 9 月发生的那场风波而从此付之东流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提请梁漱溟先生答复，那自然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毛泽东病逝于 1976 年 9 月，梁漱溟病逝于 1988 年 6 月）。梁漱溟听罢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自 1953 年 9 月之后。我的确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但我心里领会到，



我自1953年9月之后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仍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事实正是这样：梁漱溟自1953年9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之后，虽然对所争论的问题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心里委屈，但同时也为自己如此目中无人地当众顶撞毛泽东的行为而深感懊悔。事后不久，梁漱溟苦苦思索，想出了八个大字，即：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他没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而是给当时的政协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均暂不参加，以求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读书学习，闭门思过。信发出后，梁漱溟真的不去政协了。但不多久，陈、李即派人告知，说政协该发给他的通知一律照发，能不能出席会议由梁漱溟自己酌定。陈、李的答复，梁漱溟心中明白，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自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常常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笔者曾就此对梁漱溟先生进行采访。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20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第二，毛泽东大半生功绩卓著，到晚年却铸成大错，因此纵观其一生，不止有一个毛泽东。没有同一个不变的毛泽东，而只有变化着的毛泽东，若干个不同的毛泽东，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国内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解放初期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这样以其独特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但无论对谁的提问，梁漱溟在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在缅怀中深怀敬意，神态是颇为严肃而动情的。

同样的问题是，有不少读者发问，自1953年9月那场风波之后，毛泽东心目中是怎样看待梁漱溟这个与众不同的老朋友的呢？笔者认为，最能说明

问题的就是本文一开头点出的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那段批示。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刚刚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在宣传部门和文艺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内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他的名对于解放党内的领导干部有重要意义。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的只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动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名有其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毛泽东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

当笔者得知上述批示的内容时，梁漱溟老先生身体状况已经较差，我在探望时向他作了转述。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 四、在反右斗争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语

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 1957 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 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却相当广。从 1953 年到 1957 年这 4 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了 1957 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 1953 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年始，就梦寐以求中国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毛主席的礼遇，但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三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他没有想到1957年伊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界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是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学术味不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梁漱溟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90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从他70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教色彩。他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19岁茹素一直坚持到95岁病逝，达76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点还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益上，也如同衣食住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他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在其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中，常常出现他为坚持自认为正确的己见而不顾一切的举动，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30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90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这位必须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

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其1957年被判为“右派”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2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梁漱溟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 五、梁漱溟 1958 年向党交心

有些细心的读者，在看完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之后给我写信，指出我有意隐去了某些重要史实，希望能在今后披露于众。几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本文所涉及的主体内容发生在我国实行所谓“大跃进”的 1958 年。第一，原材料是我在 80 年代撰写《梁漱溟问答录》时梁先生本人提供给我的；第二，该材料的内容梁先生在我担任学习组秘书的长达二十余年的学习会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我在本文中发表的述评内容就是以这些发言或谈话的内容为依据。更重要的是借撰写此文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白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

**1958 年 4 月 17 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原话摘录一：**

我的体会是交心要说心里话。如果允许我说心里话，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心，我觉得不满足。我认为应该深切细致地谈，才能有助于

我的思想改造。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情况就是一肚子疑问——疑问多。因为我从来爱有自己的意见、要求、主张、看法，似乎成了一个体系。自信心很强，非常自以为是。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受到事实的教训，才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对。

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但至今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没有新的认识和见解代替时，这看法和意见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不那么自信了，意见常常变成了疑问，容易有意见也就变成了容易有疑问。不过在解放之初，我受的事实教训不够，仍然常常固执己见。举例说抗美援朝，那是一九五零年的事。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四日，领导上派人到颐和园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我谢绝了。因为九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约我谈话时，还对我分析中国不会参与打仗，而派来的人却说要出兵，我认为不妥，出兵对我们不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其他事实也一件件教训我不能太自信。但是，自信是不太自信了，却并不轻易接受自己还搞不通的事，因此许多半信半疑的看法和意见，仍然存留在脑中。



## 述评之一：关于“红心”、“黑心”和“白心”

1958年我国经济“大跃进”的是非得失，历史已作了结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反映这一经济上的“大跃进”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构想，对它的超前的乌托邦式的实质及其危害，并未作深层的思考进而作出深刻的研讨。这经济“大跃进时代”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跃进”内容之一，便是“向党交心”，这是紧接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发动的为“争取大多数”的思想改造运动。

梁漱溟发言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说到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第一句话是表明他不敢苟同所谓的“交黑心”，第二句话则正面表示他的心没有多少黑的或白的，第三句话——是重申他一生恪守的“讲真话”的主张。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也没有什么“白心”。对这种“黑心”、“红心”、“白心”之说，梁漱溟在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20年间，曾多次提到过。在十年“文革”结束的1976年底的一次学习会上，梁漱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心黑手毒——这是中国老百姓对历史上一切恶人下的结论，‘四人帮’的罪孽之重可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臭名昭著的巨奸大恶相比而毫不逊色！我想说的是十八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交心’运动，几乎无例外地自己说自己的心是‘黑’的，要交出‘黑心’，以换得‘红心’。我当时的看法是，领导上要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思想，使自己的心‘红’起来，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其本意我并不反对；我不敢苟同的是为着换取

这颗‘红心’，似乎必须交出一颗‘黑心’！其一，我们这些人的心未必都是‘黑’的——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毛病，从前走过坎坷的道路，但我们自年幼起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且至老而不变，难道这也是‘黑’的？其二，要塑造一颗‘红心’，不是一交‘黑心’就能完成，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是漫长的，并非轻而易举的。这些且不说它了，重要的是不能一味自我菲薄，动不动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马克思主义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对自己也应当实事求是。如是，要回到本题，则我们这些人的心不能说是‘黑’的；要说‘黑’，则对不起，你就与王、张、江、姚们同流合污，成为一丘之貉了。”梁漱溟的这段话，如在 18 年前的 1958 年，他自然是不可能说得这么透彻的。

## 述评之二：梁漱溟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梁漱溟说：“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 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解放前梁漱溟同共产党的分歧何在？二是解放后梁漱溟是怎样被事实教训而不能不佩服共产党的？

对第一个问题，梁漱溟在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的学习会上，也曾多次涉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梁漱溟从“五四”运动之前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就与李大钊、陈独秀相熟，特别是与李大钊交往甚密，友谊颇深，直至 1927 年李大钊牺牲，梁漱溟先是多方奔走营救，后又是李大钊后事重办最出力的一位。李大钊的挚友、早期共产党人于

树德、张申府等，均是梁漱溟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由于上述种种历史原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梁漱溟就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的“汉子”，他十分敬佩他们身上那股不为己利而为民族国家存亡兴衰奋斗不息的“精神”。梁漱溟的这种认识，从李大钊至毛泽东，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都没有改变。这也反衬出梁自身也有这股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使他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一位独特的同路人。第二，对于如何改造旧中国 and 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梁漱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1938年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梁漱溟取得国共双方的同意和支持，风尘仆仆，只身奔赴延安，梁是以“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社会贤达和国民参政会成员的身份赴延安的。毛泽东礼遇梁漱溟，多次见面交谈，其中有两次是通宵长谈。对于这次延安之行，梁漱溟除在学习会上常常有所涉及外，曾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接受笔者连续采访，整理后经梁先生审定，现以梁本人的口吻，摘录如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军队坚持数月。失利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即后来的“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竟无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我如此失望，我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十分悲观，这是一。再一点，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我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还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精粹》的小册子；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曾经是我

当年的挚友。但我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社会的研究，却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的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这个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由于我是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这个愿望和要求向蒋介石提出，他立刻同意了。接着便告诉了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我便很快成行。在延安，我同毛泽东见面谈话若干次，但最重要的是两个通宵的长谈。

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始，至次日凌晨止。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内容，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由我先讲。我坦率地谈到对目前的局势我的失望，我的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我明确提出到延安是讨教来的，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地听着，抽烟，喝茶，不打断我的话。等我把话说完，他绽露出笑容，站起来，面对着我，挥动着手，十分果断而有力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没有别的可能！”

毛泽东谈话一开头神态就这样坚定不移，语气是这样斩钉截铁，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应当指出的是，这次毛泽东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和观点，即是他后来不久写成并发表、出版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后来这力作的问世，自然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要比毛本人同某个人谈话，甚至比在万人大会上作报告大得多了。

梁漱溟“向党交心”原文中提及“1938年我在延安和毛主席辩论两个通宵”。“辩论”者，意指有分歧也！而事实如上所述，梁与毛的第一次长谈，不仅没有分歧，而且梁对毛甚为叹服，这自然是建立在爱国抗日基础上的“同”；正是这个“同”，使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即便1953年风波之后，毛与梁中断了直接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右派”老朋友忘却，以至到了1974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两年，他还在一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批示中，专门提到梁漱溟，与当时尚未“解放”的周扬并列。

梁漱溟如何对待毛泽东，前述1938年初延安首次长谈一段是其中一例；1945年，梁漱溟还二赴延安，与所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长谈。解放后，在1953年9月之前，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少数几位经常被请进中南海的座上客之一。经过1953年的那场风波，直至1976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二人之间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

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 83 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瞩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而只有变化中的许多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 20 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的了。

### 述评之三：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通宵的一个问题

前面的述评，是由梁漱溟 1938 年初与毛泽东在延安第一次长谈得出的二人之“同”而发出的。那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异”也就是分歧——实际是严重的分歧，又表现在哪里呢？现在就请读者阅读当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二次长谈。仍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继续摘录如下：

毛泽东约我的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不止是谈到次日凌晨，而是谈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

话的内容是如何改造这个旧中国和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头一天我把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请他指教。隔天约我谈话，毛对我说，他已翻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拿给我看。毛泽东坦率地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总的看，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即所谓发挥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作用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从理论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它的作用。我们对此发生了一场争论。

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

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和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性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指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指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



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朋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记得到门口他最后对我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暂不作结论，姑且听下回分解吧。

上述材料已将梁漱溟在解放前同共产党的分歧症结说得明明白白。梁漱溟在旧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政治和社会实践三十多年，有其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他有两句自勉的名言：“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笔者述评，若以梁漱溟解放前数十年的言论、行动观之，他认真做到了第一句话，包括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内，从来在人格上不敢菲薄而颇致敬重，且不论见解主张上有多大的歧见；共产党人对待梁漱溟也求同存异，引为朋友，尽管下至解放前夕，梁漱溟仍未放弃自己的见解主张，未北上参加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仍在解放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电邀梁漱溟由四川到北京，视为上宾。如前所述，这人格上的互相敬重，其基点即共同点是爱国，他们爱国家爱民族之心是相通的。但论及那第二句话，却可以说梁漱溟并没有兑现或基本上没有做到。就以梁漱溟与毛泽东辩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核心问题而言，无论是 1938 年之前，还是 1938 年之后，甚至到了全国解放之时，梁漱溟都“过于相信自己的识见”，所谓“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 述评之四：阶级斗争的事实胜于改良主义的雄辩

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于 1949 年 4 月至 12 月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20 世纪 50 年代初进京，经历了两年时间的沉默，到 1951 年 10 月间，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文章一开头就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所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梁漱溟的这番话，首次向世人宣布自己的思想见解发生了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在思想见解上固执己见的人发生转变的呢？其内因暂且不说，在外因方面，首推毛泽东对梁本人的谆谆教诲。在这两年时间里，除了思想上生活上间接直接的关心，毛泽东差不多一年中有若干次把梁漱溟请进中南海，促膝长谈，亲自帮助梁漱溟认识新社会，抛弃旧思想。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安排下，梁漱溟于 1950 年 4 月至 9 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考察，亲眼看到大部分是旧地重游的半个中国在短短两年中发生的巨变；1951 年 5 月至 8 月，梁漱溟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的农民与他 30 年代搞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是多么不同。正是客观事实的猛烈冲击力，推动了梁漱溟的转变。他这篇谈转变的长文中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 1949 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至？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梁漱溟的这段话，用的是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述的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在旧中国漫长的三十多年岁月中，梁漱溟曾经固执己见，不承认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的上述认识无疑是对自己坚持几十年的改良主义主张的否定，也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首次公开的肯定。事实胜于雄辩，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梁漱溟及其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当然，有了这个转变，不见得在各种问题上都能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也是事实。

## 1958 年 4 月 17 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摘录二：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亦有很好的事实教训。本来我还不相信国家的统一当真稳定下去。但到下面一看，我这才相信了，毛主席的领导真使我五体投地佩服。他确是高明英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语可形容。反观自己，简直太蠢了。可是意见还是有，有时还要说说。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我发言曾引起很大风波。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我谈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我再讲一遍，就引起了大波澜了。当时批判我反对总路线，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反省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但非错在反对总路线上。我向领导上自承错误，但到今天始终没有承认反对总路线。当然也许我不明白，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上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做检讨。

一九五五年一整年，从一月到十二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一九五五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八十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

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之言。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尚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不过这些哲学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可不谈。现在要紧的是自问政治上的措施我有无抱反感。且举最近的反右运动为例，我没有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右，说完全没有却亦不是，我很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去年人大开会时，七月四日我和我内人曾以选民资格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请求撤销六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可是文章写不出写不好——自己思想不够明晰。相反的，对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迭。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当然我是指少数几个人，不是指所有右派，许多右派我并不了解。我可举我所了解的一人为例，那就是医药界的金宝善先生。土改时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深知其心拥护党，丝毫无问题。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亦不甚知其事实究竟。从报纸上看金先生所犯错误，一点是他说中医尽管有疗效明验仍不好算是科学，一点是他说预防为主的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我就同意这话，我不认为是错，似不应把他归入右派。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领导上把他判归为右派亦许有理由吧，但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

## 述评之五：土改对梁漱溟“有很好的事实教训”

多年来一直有人屡次批判梁漱溟在土改运动中站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多次为地主说话而对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无动于衷，等等。但看看梁漱溟交心材料中的自白，事实不是这样。

1951 年春，中央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部分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赴西南参加土改运动，参加者不仅自愿报名，而且要得到批准才能成为土改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是被指派去的。梁漱溟也不例外。他自动报名，批准后得到一点照顾，即让他的老秘书黄良庸随行（黄也是自愿报名得到批准的正式成员）。由于梁所在的川东合川县这个分团的成员大多年岁稍长，实际上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考察土改，其中许多人晚上住在城里，白天才安排下乡参加土改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梁坚持要深入乡下，不能只当参观者。梁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即晚间住在这个县的云门乡，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与农民谈话，梁漱溟都参加了。当然，仍限于参观学习，不过要比住在城里的人看得更真更细罢了。

梁漱溟 8 月 30 日回到北京，9 月 3 日晚间毛泽东就约他去谈话。毛主席派车把梁漱溟从颐和园内住所（梁住在颐和园是毛主席关照安排的——笔者注）接到中南海，还是在丰泽园内。梁漱溟进门时正赶上章乃器告退，毛引梁进屋后即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讲过了，我们先吃饭菜再聊吧。于是毛主席请梁漱溟就餐，全是素菜，显然是专为梁准备的（梁从 19 岁素食直至 95 岁病逝，从未中断）。饭后毛才问梁，对土改，对四川，印象如何？



梁漱溟对毛主席着重谈了两方面。

一是对土改，他说这次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地改革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共产党领导得法，农民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梁漱溟也指出，有些政策下边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和影响均不好。毛主席听罢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打倒地主，给他出路。有给出路的政策，地主也能分到一份土地，那么，大多数地主就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难多少年了，对地主——特别是恶霸地主深仇大恨。怒火一点着，控制不住，就会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在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政策水平。只要他们能基本上执行好土改的各项政策，大的偏差就能避免。

二是对四川的印象。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住在四川生活若干年，那是一个很复杂很混乱的地方。变化这么快，的确没有想到。梁指出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应首推刘（伯承）、邓（小平）治政有方。梁还举解决四川袍哥（帮会）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悠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要解决十分棘手。听说邓小平采取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孤立极少数，这桩事办得漂亮。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被瓦解了；相反，若一一追究，都正好促使他们抱成死团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一清二楚。邓小平既年轻又有才干，由此可见一斑。毛主席听着梁的话，竟笑出声来，说梁先生看人还蛮准呢，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统观上述两点，1951 年春夏梁漱溟赴四川参加土改团，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收获和感受是不小的。后来的历次批梁，均不承认或只字不提这些事实，都因为总是带着“左”的框框，把梁看成“反面教员”、里里外外一无是处的缘故。



## 六、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在 1953 年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之后，一直在家闭门思过，潜心读书，很少参加会议和活动。他虽然受到极为严厉的批判，但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既没有正式戴什么政治帽子，还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活动，其结果出于他的意料，也使他感到欣慰。

但是，更使他意外和欣慰的，是自 1953 年之后，国家大局稳定统一，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新鲜事物不断涌现。他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而始终未得到发挥的力量被充分发挥出来了。相比之下，个人的得失是非又算得了什么。

### 梁漱溟特别赞赏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特别使梁漱溟先生惊喜的是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他认真阅读和学习了中共八大的重要讲话和文件。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由于梁漱溟先生在 1964 年、1965 年再度受到批判的事情，其实质与这两段话关系密

切，请允许笔者将它摘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梁漱溟先生何以特别赞赏中共这两段结论性的政治断语呢？这在他自己，是有着很长久的历史背景和很深刻的思想原因的。

## 梁漱溟在解放后两年来的思想转变

梁漱溟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而后进北京大学任教，潜心研究儒学；进而走出书斋，搞乡村建设，直至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奔走和平出力，始终从强烈的爱国思想出发，渴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实现稳定、统一，发展经济建设，摆脱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局面，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这一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落了空。另一方面，从哲学思想到现实政治，由于他自身走过的历史道路和独特的个性，



◎民国初年的梁漱溟

他又是多年来一直只承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化现象，但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他在旧中国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爱国爱民的好汉子，但要在中国走阶级斗争的路子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却行不通。因为这，在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主席作连续的彻夜长谈时，尽管彼此间关于抗日问题谈得投机，他十分钦佩毛泽东在抗日前途方面的远见卓识，但一谈到中国的前途

与阶级斗争问题时，他们便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天已大亮而争论仍然相持不下时，毛泽东坦然而风趣地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以先不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忆犹新。

1949年10月，新中国在人民革命隆隆的炮声中诞生。铁一般的事实为十余年前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作出了结论。

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他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事实，细细回顾一去延安时与毛泽东的那场争论，在毛泽东主席多次找他到中南海长谈，并安排他去各地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写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发表于报端。

梁漱溟先生在文章中说：

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来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纪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所以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

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这就是说，梁漱溟先生在全国解放之初，已经开始认识自己多年来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

但对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解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发展，梁先生当然是认识模糊，甚至是茫然无知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似乎一个也少不得，当仍属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范围之列。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梁漱溟先生搞不清楚。不过在他的思想愿望上，是但愿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无。他自己早年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所涉猎，还撰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但后来不信仰了。解放后，他认真补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和文章，据他自己一知半解的推论，搞建设，搞科研，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最繁重的任务，而发展生产总不会也归属阶级斗争之列吧？他还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觉得由社会主义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的学说怕不一定适用，它应该是一步步减弱，而不是一天比一天激烈。但梁漱溟的这些认识，自然没有实践的基础，也缺乏理论依据，因此只是在他头脑里时隐时现而已，从来没有公开讲过，他个人没有能力说清楚这样的大问题。

所以梁漱溟先生读了中共八大的这个《决议》，如茅塞顿开，由衷地佩服领导党的高明和远见。他甚至拍手叫好，说：“这个结论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

## 1957 年大鸣大放时梁漱溟一言未发

梁漱溟先生自然也欣赏中共八大召开这一年来掀起的向科学进军和经济建设高潮。使他感到意外的是，1957 年伊始，接踵而来的却是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热闹非凡，提什么意见，说什么话的都有。

但是，大多数的意见，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的弊病，直接关系到发展经济建设的建议却不多。梁漱溟注意到这一情况，加之 1953 年的事记忆犹新，他决定自己不参加鸣放会，不发表意见。有的老朋友上门了，劝他也不妨说几句话。好几位新闻记者找他采访，要求他谈谈感想，一吐为快。他统统婉言谢绝，他决心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但是，梁漱溟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并不是预料到后头还跟着一个“反右派”运动，他没有这么高明。当“反右派”的雷声一响，许多人遭到批判，诸如他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等竟成了大右派时，梁漱溟也是十分震惊的。当然，他本人一句现行的言论也没有，“右派”的帽子便没有他的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梁漱溟（左）与汪东  
林合影。

使梁漱溟疑惑不解的是这场“反右派”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那么，不到一年前中共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那个《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作为一个政党，要改变自己如此重大的有着历史转折意义的决策，还要不要通过自己同一职权的代表大会？梁漱溟想着这些，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便向人讨教，只好闷在肚子里。

梁漱溟先生带着这个大问号，细细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反右派斗争后重新整理发表的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话，就是：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斗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 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文招来了批判

梁漱溟先生端坐在书斋里，拿这段结论与中共八大《决议》的结论细细比较、分析，认为“变化”是有的，但似乎还看不出有根本性的变化。不是有“基本结束”这个词吗？不是还有“向自然开战”吗？这就是说，虽然“反右派”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则是持久的、主要的。梁漱溟在茫然失措中得到了

某些慰藉。

鉴于此，当1958年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热潮的时候，尽管梁漱溟先生同许多人一样在思想、行动上处处跟不上，但一开始都认为，这正是建设高潮到来的一种表现。因此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他着手写作题为《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副题为《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之由来》）的长文，于1961年完成，全文约7万字。他写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一是中共八大的《决议》，二是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矛盾论》、《实践论》。梁漱溟在这篇长文中一再发挥的论点，在1964年底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申述时，招来了一场批判。

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一系列论断传达之后，特别是城市的“新三反”和农村的“四清”运动真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研讨会”期间，94岁高龄的梁漱溟在会下接受海外学者的访问。



的搞起来以后，梁漱溟愕然了。难道中共真的要放弃八大《决议》作出的那个结论了吗？这可是事关国家、民族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啊！

多年来，梁漱溟先生一直是不轻易赞同别人而一旦赞同又不肯轻易改变的人。他的固执己见在旁人看来常常近乎顽固，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有个直属学习组，由建国初期的学习座谈会演变而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分东城、西城两个分组。委员们自愿报名参加学习，每周都有一两次学习会，要来就来，不来亦可告假，颇有“神仙会”的味道。梁漱溟先生是早就报了名的，但很少到会，因他正埋头于写作那篇7万字的大文章。他听说马寅初先生在东城学习组高谈阔论，洋洋万言，内容引人关注，也没有时间去聆听。时为1961年前后。到了1962年底1963年初，由于北戴河会议劲风猛吹，梁漱溟决定去参加学习会，主要任务是多听少说，尽量去搞清发生突变的根本原因和来龙去脉。其间还组织去山西、河北农村参观“四清”，察看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但梁漱溟收效甚微。他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他保持沉默，很少说话。

## 梁漱溟不赞同用阶级斗争一个道理来说明一切的立论

1964年底，梁漱溟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人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若干年来政府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在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许多人的发言都十分肯定地说，政府工作报告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所以报告才好得很，并推而广之地立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各项成就之取得，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抓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梁漱溟心里不赞同这种用阶级斗争这个

大道理来说明一切的立论。他想起了中共八大的《决议》，也想起自己那篇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写的长文。但他觉得，在人大、政协这样庄重的会议上，与别人发生冲突，进行争论是不适宜的。而且，他也没有把握否认阶级斗争至今还发生作用的事实。他因此决定，正面阐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各抒己见，总不妨吧。

于是，他在分组讨论会上作了一篇发言，整理成文字有四五千字。其要点有：

周总理的长篇报告论述到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据我领会，则自首至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

第一个大道理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何所指？即一切客观规律是也！认识此必然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能因之用之以制胜于客观事物，这便能取得主动权了。人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不循乎必然规律盲目而动，便要碰钉子，要失败，落于被动而没有主动可言，亦没有自由可言。反之，果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认识其客观规律而掌握之，行动之，则工作成就可观，今后亦能顺利前进。我认为周总理报告第3页、20页、22页、23页都说到这个意思。回顾建国十五年来走过的路，事实也是这样。

第二个大道理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

这前后两个大道理是彼此配合、不可分割的。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可以说是科学之事，后者不妨说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在事实上也往往结合在一起的，请看大庆油田的惊人成功，不是

眼前最好的具体事例吗？

周总理的报告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上面所举事例还是奇迹之小者，奇迹之大者就是建国十五年来以从未有过的统一、稳定、繁荣震动了世界的中国。大奇迹也好，小奇迹也好，寻其所以出现，总不外乎“科学之事”、“道德之事”这两个道理。我们运用这两个道理就可以说明它、解释它。两个道理都要紧，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主要的，一切都依靠人。这二点要往深处说，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潜在的，有待于领导去启发、培养和运用。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中国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今天也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唯独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为什么我说的这两个道理独被共产党所掌握发挥？这无疑是共产党毛主席所本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两个道理又是同无产阶级的思想、精神分不开的。我试申言其理（略）。

归结起来一句话：共产党、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民族之前途，自然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其力量无可争议是当然的。与此同时，在革命进程中，中共从建党、建军而建国，四十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在手，中共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 对毫不切题的批判，梁漱溟不予理睬

梁漱溟先生的这篇发言，立即引起旁人的指责。有的问，为什么人家都肯定阶级斗争的作用，而梁某人对阶级斗争只字不提，却侈谈什么两个大道理，是何居心？更有的进一步上纲，说梁某人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什么两个大道理，不过是以自己那一套反动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做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由于这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分组范围的讨论，梁漱溟觉着旁人所责与自己所讲毫不切题，便听之任之，不予理睬。

不料在事隔几天后临近政协大会闭幕的那一天，梁漱溟在大会会场的座位上发现有一篇专门指责他小组发言的大会书面发言。这篇书面发言重复分组会上的指责，并进一步发挥，说梁某人不仅否定阶级斗争，而且曲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阶级路线，而且推断“从梁漱溟的反动立场、观点，可以看出反映在旧知识分子当中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等等。梁漱溟感到不满意的不是这篇书面发言批判他的调子有多高，而是大会并没有同时印发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这样，实际上出席大会的近千名政协委员，就只能听这篇书面发言的一面之词。梁漱溟想起而抗争，但没有立即发作。不料，在这次大会进行期间，大会执行主席竟在讲话中专门指出这篇书面发言值得一看，而只字未提梁在分组会上实际都讲了些什么。梁漱溟至此已忍耐不住，便立即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申辩此大会书面发言对他的小组发言断章取义，胡加歪曲，而大会执行主席又偏听一面之词，乱加肯定，实不足以服人。他因此要求大会给他答辩的机会，以正视听。梁漱溟把这封短信直接交给了并非是大会议执行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

无奈交信时已临近大会散会，而第二天便是大会的闭幕式。梁漱溟深知，不能也不应该因为他一个人的事而延迟大会的闭幕。因此他在给大会主席团的短信中同时提出，如时间来不及，要求今后提供辩论的机会。

在政协大会闭幕会上，周恩来主席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民主、革命的大会。他在谈到民主的大会时，提到有一位委员来信要求给辩论的机会，可以在大会闭幕后安排，意在充分发扬民主。果然在大会后不久，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通知梁，说大会主席团已将信件转给学委会，经研究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要梁先作准备。

## 在政协学习委员会上，梁漱溟作了长达八千字的答辩

从1965年5月至10月间，前后举行辩论几十次，范围是政协直属组全体成员，邀请作大会书面发言的一位代表列席。但辩论并无结果。使梁漱溟深感失望的是，所有在会上发言的人，都没有针对他的两个大道理本身进行辩论，而是一味离题引申，上纲上线。诸如：批他的所谓“科学之事”，其反动实质是梁指责党没有掌握科学，讥讽三面红旗和各种群众运动都是非“科学之事”，而所谓“道德之事”，是梁妄图以封建道德观代替党的群众路线，其实质是根本否定党的阶级路线。最后上纲到是梁某人挖空心思否定阶级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梁所讲的两个大道理发言中所不曾有的。当然许多发言中都讲到了“大好形势”如何如何，而“大好形势”的由来，一切成就的取得，大都离不开大抓阶级斗争，甚至还有人说到，在科学实验中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绝没有离开阶级斗争的“纯科学”云云。梁漱溟对这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发言，一直洗耳恭听。

不过这次的大辩论，虽然批判的火药味很浓，很使梁漱溟难以接受，但亦有颇使他满意之处，即上级指示，允许他答辩，允许他保留不同意见。梁漱溟因此在1965年8月3日，在学习会上作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答辩发言，重申他的基本观点和要求辩论的本意。

笔者在这里摘录梁漱溟答辩发言中几个颇有特色的段落，读者细细读来，即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感到颇有发人深思之处。梁漱溟说：

某某指我“否定阶级斗争”，指我为“超阶级的人性论”和“封建主义的道德观”，指我的“科学之事”，“道德之事”两个道理不对，只有他的“阶级斗争”一个道理对，最后归结于我的立场、观点反动，历史上如此，至今没有变。

某某讲这些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我把自己的发言稿翻了又翻，脑子里想了又想，他诬指我这一切，并不针对我的整篇发言，或者是发言的某一章节、段落，唯一的根据是：我的发言中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说我是有意不提，不提就是否定，就是反对。

某某不但在政协大会分组会上首先向我发难，而且与另一人联合向大会提出了书面发言，大会执行主席还在大会上指出让大家看看这个发言。某某这样说，某某执行主席这样信，大会群众自然就这样听，我就受到不白之冤。

我从来没有说过否定阶级斗争，包括解放前，那时我也只是说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当然这样认识是错的，应该批判。但就是这个，也并不否定阶级斗争。至于解放以后，我更有转变，有改造。十多年来，事实很多。先有《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落归于改良主义？》，而后有《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问

题》、《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等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端，有的呈毛主席和有关领导审看，都是我思想发生转变的表现。请问，某某一口诬我否定阶级斗争，有何根据？

说到我在政协会发言的本题，虽然主要部分是论述“科学之事”与“道德之事”这两个大道理，没有标出“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但其结论是何以这两个大道理独被共产党、毛主席所掌握、所发挥，而旁人不行？答曰，这两个道理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精神分不开的，难道这不就包括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彼此的分歧是：我认为某某的一个道理不够，阶级斗争不足以尽述周总理报告之全文，而我的两个道理才对，才全，虽然不见“阶级斗争”四字而实际四字自在其中，说我的发言否定阶级斗争那是曲解了我的本意。

下面我着重说一说思想认识上的唯心论和政治上（即立场）的反动问题。一共是三句话：一是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可以肯定没有落于唯心窠臼；二是我不敢保证自己能免于唯心，即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三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在政治上不反动。

为什么？先说第一点，我的发言只是根据周总理报告的理论阐述（含报告中引用毛主席的话）和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谨慎地说出我的体会如是如是，并没有发挥我自己的思想，这唯心主义何来之有？第二点，我何以不敢保证自己能免于唯心？那是因为，一个人觉悟了唯心论不对，机械唯物论亦不对，只有辩证唯物论才是对的，这不难。但要掌握辩证唯物论来判断事物，解决问题，却很难很难。这一次用对了，下一次不一定对；昨天对了，今天不一定对；今天对了，明天不一定准对。假如只会说会讲不会用，那就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了。经验主义亦是唯心。主观上要走辩证唯物论路的人，大抵落于机械唯物者较少，而落于唯心的时候很多。尽管你不想走唯心的路，仍然往往难免于唯心。这就是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免于唯心的缘故，何况我的思想比别人更容易落于唯心呢？落于唯心非我愿，是否果能免于唯心，却无把握，不敢保证。第三点，既然思想上难免落于唯心，会不会政治上就落于反动呢？回答是否定的。

一个人反对唯心主义，而遇事不自觉地落于唯心，那只是一时的认识不清，是思想问题。一个人政治上基本上不反动而有时不自觉地落于反动，仍然是认识不清的思想范围的问题。只有政治上自觉地反动，才是真反动。据此，我虽不敢保证自己不唯心，却可以保证自己不反动。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思想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好，但我的政治问题却基本上解决了。我在新中国成立十六年后讲这番话，对自己作这个结论，绝非是自我标榜，而是有十分把握的。真不知某某对我左一个反动，右一个反动，甚至是反动透顶，所凭所据何在？如果指的是我的过去，特别是解放以前的某一个阶段，此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指我已经觉悟、改造后的今天，却不能不令人怀疑某某是否也是“难免于唯心”，才这样不看事实，任意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

## “决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

梁漱溟的这一段发言，自以为言之成理。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招





来的自然只能是再升一级的批判热潮。梁漱溟凭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深知最好的办法还是沉默不语，洗耳静听。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吹来刮去，老问题又引出了新问题，迫使他不得不开口，而一开口就又增加了新的批判材料。笔者在这里择其重要之点，记述两件事，供读者一阅。

第一件事，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和共同向自然开战的问题。



◎1986年11月，梁漱溟（右二）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左二）在一起。

1964年政协曾组织部分委员到山西农村参观“社教”（即“四清”）运动，在座谈观感时，梁漱溟曾在发言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意思是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然作斗争时，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但并没有联系“社教”运动作更多的发挥。到了转年辩论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时，有人揭发说，梁某人在山西参观时就讲过阶级斗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要梁漱溟回答，其用心是不是妄图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梁漱溟当场答复时重新引用和解释了恩格斯的话，并详细复述了他多年来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认识上的演变过程。他在这篇发言的最后，出人意料地端出自己的真实思想。梁漱溟说：

结合恩格斯的论断，联系中共八大的《决议》，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

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头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样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思想认识上就转不过弯来。但我申明，我并非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我只是思想认识上的不理解……

梁漱溟的这段话，使在座的人甚感惊讶，因为时至今日，竟真有如此不识时务而顽固到底的人。同时也使会议的主持人感到满足，因为经过多日的批判、帮助之后，梁漱溟终于吐露了心里话，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对大抓阶级斗争是不赞同的。

第二件事，关于惩罚是不是进入共产主义的一项主要办法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社教”运动，涉及对犯错误（包括犯罪）的干部是以教育为主，还是以惩罚为主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梁漱溟这次是自愿发言的，他把话题扯得很远，还引出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梁漱溟在会上说：

惩罚是从奴隶社会以来就有、延续了数千年的老办法，现在还要采用，还不能取消，但毕竟是个人得失的东西，一定要超过这个，走教育的路子，把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步，才能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我想把话题扯得远一点，大约在民国九年或十年（1920年或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提倡社会主义学说。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李与我交往颇深，陈也与我较熟。当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学说兴趣甚浓。讨论中，有人问陈独秀：比如收拾厕所这类又脏又苦的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让谁去做？陈回答说：给受罚的人去做。我耳闻此事后不几天，当面向陈询问此事，他亦如是回答。我即对陈说：这不对，惩罚是现在人的观念，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收

拾厕所未必就是受罚的工作。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实际上那时候谁也说不清楚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了，现在提倡人人做服务员，干部、学生也要去参加掏粪劳动，这个路子是对的，是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惩罚为主。如此发展下去，应该是人人做自觉的劳动者，而不是单纯的为谋生而工作。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之日，便是惩罚的手段消亡之时，这又可以归结到恩格斯的那个科学论断上。

梁漱溟的话万变不离其“宗”，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门越唱越高的形势下，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其结果只能是引火烧身，没完没了……

二十多年的历史弹指间过去。当笔者向梁老先生重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这一段“热闹非凡”的经历时，他并不激动，只是缓缓地说：

都过去了，过去了。这几年曾有人对我说，好像我那时候看问题看得准，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不然。我之学习马列著作和各种文件，并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许多人的。至今我对



◎95岁高龄的梁漱溟（后为一艺术家自愿为梁塑的坐像）

若干问题，仍然一知半解。如果说我在那时把有的问题看对了，那也决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而只是我自己身上的那股牛劲，即：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决不随声附和，更不见风使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笔者作为梁漱溟先生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听着这段话，心中的滋味是苦是甜，是酸是辣，一时间难以搞清。

## 七、1964年：梁漱溟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梁漱溟自1953年受到严厉批判之后，较长时间在家“闭门思过”。至50年代后期成立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时，他虽然较早报了名，却并没有经常到会，即便到会也是多听少语。直到60年代初，他才经常到会，发言也多起来，但直到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之前，他都没有针对当前的时政发表系统的长篇发言。我是1962年底到政协直属组担任小组秘书工作的。一位顶头上司同我谈话的重点内容，是介绍梁漱溟的种种情况，并说正巧马寅初在政协直属组放“毒”后拂袖而去，借故不来学习请长假了，而政协这时来了个不经常到会的梁漱溟，且自此变成场场到会者，此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特别说明，梁漱溟从历史上看，则比马寅初更“反动”，更“顽固”。这对于当时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印象极深，自然也不会怀疑顶头上司的谈话。由此，只要梁漱溟一开口，哪怕只有几句话，我们做记录的都要记下来，往上汇报。只是我的记忆，在1963年至1964年的整整两年时间，梁漱溟始终没有什么印象较深的系统发言。

那么，这篇《补记1964年7月7日及12日两次发言要点》不是篇幅很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在196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再一次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之后，政协直属组的学习内容着眼点又转回到对每个学习成员进行思想改造上。因为这，在每年年中和年终，每个学习成员都要进行学习小结，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剖析自己的思想问题。自然，梁漱溟也不例外。一般说，这种小结，重点都是谈自己，而不涉及旁人，特别是不涉及当前时政的敏感问题。梁漱溟的这篇“补记”，就应该是1964年上半年的学习小结，他颇为认真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只要细细读一遍这篇“补记”，便可以十分扼要地了解梁漱溟自述的思想问题的渊源。据我在政协直属组任小组秘书20年的经历，这是他较为认真的自我剖析，而且这是自1965年以后多次对他进行大批判之后他不曾有的“态度”。他的思路和语言仍然是独特的，依然不失他一贯“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的个性，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品格。比如，对待1953年这桩已经过去十余年的大事，他依然坚守从对领袖的“态度”上去检查自己的错失，而不承认他本人在1953年发表的言论本身有什么错误。

### 补记：1964年7月7日及12日两次发言要点

李建勋先生问及我的思想问题，兹分四段作答如下：

**第一段：我缺欠的是在阶级问题上缺乏阶级感情，解放前如是，至今犹如是**

我知道阶级学说并不后于人，大约五四运动前就知道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到达长江，从追问“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而引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积数年论文而成巨册，我都有兴趣研究它。自己亦跟着大家谈论阶级问题，而实没有懂阶级。其所

以没有懂阶级者，即在缺乏阶级感情。没有感情的知道，是空泛不相干的。懂不懂阶级不在你口里会说不会说，而要看你临到社会实践上你行动起来如何——必有感情才有意志和行动，而后才证明其有真知。

## 第二段：我之缺乏阶级感情既有其一般的原因，更有其特殊的由来

阶级感情皆必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亲自直接感受，亦即其阶级处境。感受亲切深刻，莫如处于被压迫剥削之农工，漂浮流动的知识分子只间接地剥削人或偶亦受人剥削，不免肤浅或缺乏——此即一般缘由。

特殊的由来约言之有二：（1）父亲四十岁始入仕，四十岁前皆在义塾课徒为生，四十岁后仍大半靠佣书自给，是距今七十年前一个爱国维新的人。我自幼受父亲影响很大，又很特别。我没有受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所受近世学校教育亦很浅，只念了五年半的旧制中学而止。我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有《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彭翼仲先生》一文叙述到他与我父的关系及给我的影响，可参看。爱国维新在那时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一种反抗精神我至今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一身一家衣食打算而不问他事，又循常蹈故，安于庸闇。彭先生在北京首创报纸及小学（名曰“启蒙学堂”，当时尚未通行小学名称）。以此毁其家，且几以身殉。我幼时即晓得“自了汉”（当时无“个人主义”名词）及“冷血动物”之可鄙。父亲没有给我讲过书，或讲任何大篇教训的话，他启发我的思想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例如我参加辛亥革命，他表示不同意却不干涉；我倾心佛法茹素不婚，他更不愿意亦不干涉；如此之类。我从幼年起，在学业上就是自学，在行动上就是自生。其后一生的表见就是有志业而无职业，主动性极强。我一向从自身体验和观察诸前辈行事中认为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的一种发展变化，一九二七年的大革



◎梁漱溟（后排中）童年时与祖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

命又是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发展变化，我总称之为民族自救运动。它都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的。在一般外国之例，革命是阶级矛盾的爆发，但中国革命则是从外引发的而非社会内部自发的，不依靠某一阶级领导的——此即我所以看轻了阶级，缺乏阶级感情的特殊由来之一。（2）就在我参加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同时即有出世思想萌芽，后来更倾心佛法以致现在老而弥笃。佛家以贪、嗔、痴为“三毒”，为“根本惑”。阶级仇恨是一种嗔的心理，我所不取——此即缺乏阶级感情的特殊由来之二。

### 第三段：由于我没有真懂阶级，在解放后犯了许多错误

解放前的错误，主要是我奔走国事的路线错误，将于第四段中提到；这里只说在解放后的错误。此可举出以下几个事例——

一九五〇年一月半我由重庆抵京，其时主席和总理皆在莫斯科。三月十



日主席和总理回京，十一日公宴，都见到主席，承主席约于十二日夜间谈话。主席开头一句话，问我“这次可以参加政府吧？”我却回答：把我摆在外边好吧——此在今日看来很好笑，“摆在外边”不是自己站在人民外面了吗？此即不懂阶级之一例。

今天大家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我在解放初的三年却屡次不听主席的话，以上即其一例。其他几次是这样的：（1）五〇年三月十二日谈话后，我即到山东、河南、平原各省的农村参观访问，又到东北各省市参观访问，则以工业方面为主，前后共约六个月之久。这是半由我自愿，半由主席的指示。主席当时说“你不是曾在山东、河南搞过农村工作吗？你现在去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你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去看看，比较比较。”九月中旬我从东北回京，廿三日夜晚主席邀谈，在询问我对各地观感后，又对我说“你看了老解放区，还没有看新解放区，看了北方，还没有看南方。你可以再出去广东看看吧！”我以走动过甚久，正想休息，且想以风闻感想写出来，没有接受。（2）五一年春，中央有西南土改第一团之组织，我自动向统战部请求参加，即因省悟主席要我看南方解放者：意在要我看土改也。在川东参加土改四个月，于八月卅日回京。九月三日晚间又承主席邀谈。谈话末了，又劝我去广东看土改。我正感疲劳，复不接受。（3）五二年八月七日午后一时半至三时五十分承主席召去谈话甚多。我请求去苏联做学术研究，主席未许可，却又对我说“你去国内各地方做社会调查好吧！”我不懂主席命意，我问“调查什么？”主席说“你喜欢调查什么地方就调查什么。”主席又说“现在各地交通都很方便，你喜欢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我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一切照料和方便。”我心中无意接受，又不好拒绝，表示考虑决定。次日遇徐冰同志传达主席之意，问我何时出发，同行几

人。先到何处，需要准备事项有哪些，一切可与统战部商洽办理，他皆负责代办。但我最后还是没接受主席意旨——不愿出去。

及至一九五六年政协大会周总理政治报告中提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说改造一般必须经过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1）实际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2）自己业务的实践。（3）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然后才行。而最能使旧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改造的尤在第（1）层。我方恍然明白主席再三再四要我出去参观考查的用意，是在帮助我改造思想。主席爱人以德，宅心仁厚，我即身受其惠，乃全然辜负了。真是糊涂！悔恨之余，乃始晓得以后必须听主席的话。

再则，五〇年夏间我以特邀代表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凡新来参加者人人发言，而我自始至终独一言不发，亦是由于缺乏阶级觉悟而有的一次大错误。我在会议席上缺乏自己侧身人民行列中欣幸之情，在感情上没有站在领导党这面来，倔强地不愿说话。会后好多朋友如邵力子先生等都责问我，我亦只自悔其态度生硬而已，还不明白是自己阶级感情不对头。五一年的政协大会上，徐冰和齐燕铭两同志后来动员我发言。我虽有短篇发言，今天看来仍然不好，即仍然缺乏像劳动人民那样热烈拥护领导的心情。

还有，五〇年十月廿五日我志愿军抗美援朝前夕，领导上把两个性质上相近的组织合并改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会，派人来征我同意参加其宣传方面的工作，我未允。我要求统战部给我解说明白后，再行决定。因九月廿三日我那一次见主席时，曾以战事迫近东北为问，主席向我分析中美间还打不起来。同时我思想上亦以出兵为疑。所以经统战部徐冰同志与我谈话后，仍未接受工作任务。其后林老（林伯渠先生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又约我便饭谈话，问我对出兵的意见，我一面陈其所疑，一面表示此事既经决定，

我自当一致拥护无贰意。事后证明援朝出兵之举，极其英明，完全正确，可以说好极了。识见短浅的我，自今以后只有永远听主席的话。

#### 第四段：我怎样从糊涂中清醒明白过来

上面说我在解放后犯了许多错误，只说到一九五二年而未及五三年的事。五三年的事情首尾经过有十天，这里不再叙说（一九五八年冬向党交心之时曾经叙述一次）。只说毛主席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席上警责我的三句话：（1）“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2）“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3）“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指一九五四年）政协还要推选你参加。为什么？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在受你欺骗”。那一次因我的荒唐错误，会议席上引起不小波澜。正是这样，从这以后我乃警醒于自己的错误，不再延续发展下去。现在说第四段话，正是把当初如何不服主席的指责，终于转变到诚服的过程说出来。

上次说到我回答主席不想参加政府的事，当时座中有人说我清高。在我看，清高即是“自了汉”，即是冷血动物！清高岂是我的心理！我是顾虑一旦参加政府就失去我向各方说话的作用。这里应须追叙解放前夕的事情。解放前夕，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李宗仁上台忙求和谈，曾连电邀我去南京，并电嘱重庆市长杨森备送飞机票，而我则谢绝不去。李要和谈何以必邀请我，我又何以谢绝不去呢？

说起来话长，简单言之，自从抗战初起，我即为团结抗敌而奔走于各方，胜利后又为争取和平建国而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参与两党和谈，总计前后经有八年之久。其间经过的种种曾写有《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在香港《光明报》上长篇连载五十多天。又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召开的旧政协闭幕时，我以为和谈成功，曾有“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揭于当时的《大公报》。

一九四七年冬和谈破裂，和平无望，上海《观察》杂志社又预约我写《八年努力无功录》一书（未出版）。所有这许多话今天都不用谈。只点明李要和谈所以必邀请我者正为此耳。

至于多次谢绝不去，则因一九四九年一月我见国内大局关键性的时刻到来，预先有所声明之故。我先写出“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历数内幕事实，指明其责任在蒋，而结论说：好战者已不存在，切望中共方面不要再打；



©1942年，梁漱溟自香港脱险后回到桂林时留影。

即在蒋宣布下台之日发表于重庆《大公报》。继之则有《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一文，答复当时函电纷驰要我奔走和平的朋友们，宣言“我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而不在组织（指民盟）”。那就是：我将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为什么？就为希望中共方面细心考虑我的话。我的话，有可采，即听取；无可采，即不必理睬。我不过贡献我至诚至恳的意见，既不以行动来强求，更无为行动的组织，便绝非与中共作对者。假如我应李邀而去南京，便是行动了，所以不去。

在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下，我继续发表两文，一是对国民党说话，一是对共产党说话，在《大公报》上同一天登出。对国民党拒谈战犯问题，表示必定要谈，要他们当权派全行下野。对中共则有如下的话：

第一我要说，如再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亦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亦许无意于不要

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中略）第二我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我前文所以说“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其意正在此。这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不愿它再作一度事实证明——但你们竟然要再来一度，我亦只有长叹一声！

这是我当时糊涂思想的核心（五〇年面见主席时，还迷痴地想着自己向各方说话的作用，正是对中国从此统一稳定下去尚相信不及），必须揭出于此，乃见后来所云清醒明白者正针对此而说。

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是我胸中自有一条路在。上文曾云“解放前的错误主要是我奔走国事的路线错误”将于第四段言之者即指此。这条路径积年思考，成一套具体方案，今天不须再谈。然其肇端恰在我第一次访问延安（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到延安，适为“七七”卢沟桥战事爆发后六个月）同毛主席商谈时局问题所提出来的“确定国是国策”那个主题。兹就当时问答的话筒略叙出以见其大意。（以下据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写的“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摘录）

当时我谈话的语调是很悲观的，主席则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以慰我。大致说，决定中日战争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中国自身、敌人和国际环境。求中国之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协助。国际情势日见好转，敌人则随战事之扩大与拖久而渐暴露其弱点，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年来亦已相当实现。如是，又何须悲观。末了，主席再三致意，中国自身团结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中国今日已见团结，还当求更进一步的团结。

我本是怀抱着一个团结抗敌的具体主张去请教的。谈至此，刚好提出来说。我说，如我所见，在中国人面前实有两大问题：（1）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2）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主席点头表示同意。我问：此两大问题应分开谈，抑不应分开？主席答：不应分开来。但既不是一个问题，在进行上不能无轻重、无宾主。眼前应“一切服从于抗战”，即以第一问题为主。我亦表示同意。

我于是提出单纯就眼前抗日问题上讲团结似乎不够。因吾人实有此两大问题，而且完成社会改造系吾民族自身长久之事，更为基本，与抗日为一时问题者不同。苟于此基本问题隐略不谈，则纵然团结殊不彻底。团结不彻底则抗日不力。是即从第一问题为主而言之，亦有同时确定如何解决第二问题之必要。主席于此，均不否认。且言，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主席表示，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广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我承认此亦不算过虑，却说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可以说得通）努力克服之。如其能在两大问题上涵有的巨细节目及其步骤措施均取得协议而确定下来，那便是我所要求的“确定国是国策”。

主席告诉我，他们和国民党之间各指派了八个人正在武汉开会协商制订一种共同纲领，以为抗战中一致行动的指针。我既然如此热心，可回武汉加以推动，使各方均得参加（不止两党），并由侧重商谈第一问题者而进及第二问题。假如各党派，尤其国民党愿意的话，在他们固不胜欢迎之至（附带说：后来我回到武汉，知道由于蒋要求两党合并，遭到拒绝，蒋大怒，两党协商破裂；至于其后仍有“抗战建国纲领”之公布，其中变化则不清楚）。

俗语说“打铁趁热”。借用主席当时的话来说：“抗战中的合作，决定抗

战后的合作”。按照我的设想，此时果能有国是国策之确定，则国内党派的形式关系即根本转变，从过去对立相争者转而为偕同致力的联合战线。那时即应建立我所谓“党派综合体”以为全国政权之所寄，在我的方案中属第二步。其第三步则政权治权划分开，以不沾染任何党派色彩的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司法部门为治权机关（军队警察隶属于此），执行那政权机关的一切政策决定。我认为中国国权统一稳定有计划地贯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逾于此，而断不是什么欧美式的宪政。



©1946年初，梁漱溟与民主同盟部分同志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史良、张澜、沈钧儒、梁漱溟。

当一九四六年春，重庆旧政协会上取得宪草（欧美式宪政）协议后，我到延安向主席和中共中央诸公指陈这种宪政必不能久，而提出了我的见解主张。我说现在既经各方协议只有照行，一旦发现其行不通时，希望考虑我的意见。

第四段的话（续前）

中国社会出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此一认识为

四十年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所同。为了从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要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立，此一要求又为我与中共之所同。所不同者在如何建立此一政权问题上中共走一般革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判断其走不通。

但今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却居然走通了。而我自己所设想并致力的一条路则完全落空。为了检讨自己那一判断错在何处，先须一说其所以有此判断的理由。

关于我的那些认识，此时不多谈，只简明地说一点，即上次（七月十二日）临末说到的话，现复述如次（原文见《我何以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之第七节）：

从我亲身经验的中国社会事实，使我有以认识到其特殊：

第一，中国三四十年来所深苦的分裂和内战若以外国相对照，便知其大有不同。在外国亦每有分裂之事，像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出来，即其一例。外国亦有内战，例如美国即会有南北战争。但他们分裂或战争都是基于其社会的要求有着深厚的背景（民族的宿怨、宗教的不和、政治的不平、经济的矛盾等等）。而我们呢，却不过是此一政府（此一军阀）彼一政府（彼一军阀）间的冲突罢了，于社会不相干。我曾见到从前内战时，全国各省教育会的联合会还照常举行；从社会一面看，全国之间是无隔阂可言的。历数三四十年来所苦的那些分裂和内战，没有哪一次是问题发生在社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假如把政府除外去，中国原是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浮在上面而无根的所谓政府就是了。这在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却一直见于近数十年的中国，能说不特殊吗？

第二，在没有完的分裂和内战不断破坏下，使此广大中国社会陷入一种



绝望境地，非一般社会所恒有。是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是秩序就有保全。其故即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两面彼此对立而又互相依存，成为一个结构。这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它呢。有保全即有生息长养。人类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超经济的凶狠残酷剥削下，而社会还是发展起来，并没有绝望，就为此。但中国这时不然了。它不是两面，而仿佛是三面或多面。此一军阀彼一军阀形成对立，被统治的社会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两方对立中各以应付对方为急，往往是顾不得第三者的。无秩序的破坏代替了有秩序的剥削，此广大社会乃落于纯被牺牲的地位而无可救。特别是乡村破坏的最惨。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战壕、炮火烧杀、征粮、征夫），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彼此为备战而竞争着购械增兵，以致养兵之多，甲于全世界，却非讲国防。兵多而益乱，战乱相寻，讫无了期。假果爽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事，倒也不会如此纠缠在战争中。无奈此广大社会早已同化融合为一大单位而不可分。分又分不开，合又合不拢，长期地自相砍杀，日趋毁灭。这岂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试问谁又在旁处见过这种事例？（此不为新写的）

若问此古今中外所省见之畸形病态究从何而来，我认为是：

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其内部虽有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之分，而散漫流动，缺乏固定成形之阶级以为武力之主体而形成阶级统治，即不属一般国家类型。一九一一年革命后，旧秩序既失，此散漫流动者更陷于混乱，武力更无所统属，失其工具性之故。

武力（军队）失其工具性，变成了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卅余年军阀之局面由此造成。军阀就是一指挥官领着一大批军队，占据一地盘而

吃饭。为军队而要指挥官，为指挥官而要军队。既有军队又有指挥官，那就要地盘。有机会更扩大地盘而发展军队。扩大地盘是为了发展军队；发展军队是为了扩大地盘。完全无目的、无主宰，只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纵连横，忽彼忽此，忽敌忽友，陷全国于分裂混乱之深渊而不得出。“不晓事的人还在作武力统一的迷梦，其实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呢！”（语见旧著《乡村建设理论》第三四一页）

应当指出：各方军阀还因国外各帝国主义者竞相勾结利用，而其分裂与战争乃更以加重，无法休止。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以党建军、以党建国”的口号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口号，原想要结束这局面的。但其结果却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国民革命军北伐前是这样局面，北伐完成后依然是这样局面，分毫不改。

此长期使人不知所出的局面，我想来结束它。却出我意外，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全国后，把它结束了。

是怎样结束的呢？当然就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主体来掌握武力，以武力统治全国，完全符合于阶级统治之规律而结束的。

所谓“出我意外”者何指？指我料定它要在散漫混乱中走阶级斗争——分化而斗争——的道路必然无结果；结果指全国统一稳定政权之建立。从一般规律来说，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外两面，革命即所以建立新政权，使原居下面的翻上去，原居上面的翻下来。现在中国早已不成两面，如何翻法？你走分化而斗争的道路无救于其散而且乱之势，或且加重了它，何能达到建立全国统一稳定政权那目的。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俄为师”，原就是要在中模仿着走阶级斗争道路的。假如国民党真成一个党，做到了“以党建军”，那便亦能做到“以

党建国”（新政权之建立）。无奈它不成功。其所以失败，乃在模仿得不到家。不到家者，谓其阶级基础不分明不确实也。我曾有一文，题为《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分为“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理论统一难”三层，指出国民党在模仿阶级斗争上之失误可笑，今不详谈。但我同时却说莫要笑话他们，这正是中国现社会所映射出的文章。他们固自称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却标榜“国民革命”而不说是无产阶级革命，便不能严格以相绳。且举一点来说，关于阶级基础，若严格地讲起来，请问广大中国社会究有多少近代产业工人？以之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岂不太狭隘？革命所依靠的基本队伍如此单薄微弱，又何足以为此广大社会解决问题？其于此放宽尺度，自是有不得不然者在。然而阶级基础不分明、不确实，党便不成其为党。于是个人超于党，只见许许多多个人，不见党。原说以党建军者，其结果还是落于个人掌握军权的旧辙。此即其卒不过是以新军阀替换旧军阀的由来，完全以失败告终。

此文写于一九三一年春，当时文内没有评论到中国共产党。第从其论旨引申去，亦不难看出来。那就是：严格遵循阶级斗争道路走的共产党，其阶级基础固自分明确实了。却是基础如此狭隘，力量如此单薄，又怎能解决中国问题呢？不合规格的模仿固然不行，严格地亦步亦趋也不行。分化而斗争的路在解决中国问题上无论如何适用不上。

我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不应抄袭外国文章。天下事情，短处翻过来，就是长处，这边走不通就返来走那边——分化而斗争的路走不通就走团结而合作的道路。广大的中国社会由于数千年历史同化融合之功，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大民族单位，其短处就是散漫，其好处就是无隔阂，正为今日求团结求合作准备下前提条件。中国人现在要走的道路，就是从阶级之缺乏固定成形径

直地过渡到无阶级之社会，而不是分化成两大阶级（两面）再来消灭阶级。其具体方案，即从国内各方面协商确定国是国策——如我第一次到延安向毛主席提出请教的那样——组成全国各党派综合体，以求统一于下（社会），则武力便有所归属，得其主体，而国家自然统一。它将不像外国那样以一方武力压倒另一方，求统一于上者——所有这些理论和具体方案内容的许多话一切省略，不值得再谈。

现在要谈的是：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怎样在中国把阶级斗争这条路走通的。这在我多年坚决不相信的事情（全国统一稳定政权建立起来）出现于我眼前时，不能不俯首深思细想。深思细想之后，恍然大悟毛主席真懂阶级，而我则口里会说阶级，并没有真懂阶级。

试就我能领悟到的毛主席所以成功之理，分举其要点如次：

一、主席所以成功是在以分求合。分其始也，合其终也。今天他把全国人都团合在一起了，然而功夫却是从分入手的。对照下来，我不顾阶级立场不同而只从民族立场强求全国团结合作，终落于空想无成者，其错误正坐只知求合而忌分。

所谓从分入手以求合，即在阶级社会中从反剥削入手以求团结一切反剥削的人。我不是说中国早已不成两面吗？那是偏从其分散混乱流动不定之势来说的。但在毛主席从无产阶级坚决反剥削立场来看，则社会上剥削被剥削何尝不划然分属于两面？近从一角落远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在主席眼中早把一切人们分作两边去。虽然事实上应该分到这边来的尚未分过来，应该分出那边去的尚未分出去（例如大都市的产业工人尚未参加革命，手工业者还闹“同行是冤家”，店员与老板相依，农民分散不集中，甚至有些佃雇农与地主亦一时无争，多数知识分子各行其是，在一种徬徨或游离状态中）。然经毛

主席实行的以分求合之后，就不难逐渐形成两面分开而不虚。就在分开之时，是把革命这一边全团结起来之时。

二、武装斗争是主席成功之本。建党虽为团结革命之起点，然而假如不实行武装斗争，则敌我分界未云明朗坚确，可能有人出出入入。断然实行武装斗争了，便是对于此旧社会广大人民在逐渐吸收争取过来的途程中，先冒着危险与一切混混沌沌的人们分裂、对抗而决斗。只有这样才严峻地划开敌我界限，而后谁跟着我走，谁不跟着我走，乃明朗而坚确。这是以后一切发展的真正起点，不可不知。

应当知道：实行武装斗争即是以党建军，亦就是建立革命基地政权之时。

三、前两点结合即有第三点：在坚持武装斗争中，在冒着与此旧社会一切混混沌沌的人们分裂、对抗而决斗的危险中，念念不忘争取任何可争取的人们到我这面来，力图壮大自己而削弱敌人，统一战线的工作初不亚于党建建军。这要时刻分清敌我而总不乱，却时刻化阻力为助力，不放过任何一时机会。于是在敌我形势之间大小强弱彼此对比上，从无可比拟的悬差而渐渐打平手，又渐渐地转变到敌弱而我强，敌小而我大，最后把广大人民群众都争取过来，跟着共产党走，而全国性的领导权——统一的政权即以建立。

四、主席所以成功的本中之本，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结合具体情况活学活用马列主义，不落教条，不泥程式，远非无智如我所及料知。确指其事，盖莫如先解放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乃解放到大都市（外国革命无此先例）；在武装革命过程中，使广大农民、不少知识分子从意识到生活（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生活——严格的集体生活）无产阶级革命化（具有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觉悟性）。凡我估计其阶级基础狭小、革命基本力量单薄者，全然言之不中——一切都不对。

以主席为镜乃顿悟其自己一向之错谬——

一、我虽会说阶级如何如何的话，却往往不分敌我而且求着混一敌我。例如我为民主同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揭举“言论公约”五条，其第一条即是：

抗战建国为国人共勉之大业，抗战建国纲领既为公认之指针；在此大前提下，举国之内义不当有政敌而不可以无诤友。吾人本此信念，于任何方面不敢敌对态度，而窃愿附于诤友之义，贡其诤言。

我对于当时国内相对抗而暂时合作的两大党，正都是以诤友自居，而要求他们合作到底的。

又如我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

1.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
2. 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当我一九四六年三月再次到延安，在给我开的欢迎会上即曾提来说过，向他们大家请教。因我认为这是人们彼此能合作共事的基础条件。翌年（一九四七）春我写“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发表于上海《观察》杂志叙述及此，原文有云：

举例来说，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这距离不易泯没，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有心肝，他们亦有心肝。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中略）。语其合作之所以可能，要不外有合于上陈两条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的，我敬爱这些汉子。至于见解主张之不同，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中略）。

去年三月我到延安，在他们的欢迎会上，就曾这样坦白自陈，并提出合作的基础条件，供参考。今又特提出请教于各方朋友，请教于国人。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原文见上海《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请看，我多年竟是这样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奔走国事的！

二、与上一点相连而来的，就是当我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思索设想以至奔走行动时，一贯地自己置身于阶级矛盾之外。阶级者社会组织结构上所表见之矛盾也。既没有矛盾以外的事物，亦没有阶级以外的人。人不为其阶级之所限定，是由人有自觉能动性，然处理任何阶级问题，仍不能离开自己所处地位而推动其解决。自外于阶级以求之，即不懂阶级了。

阶级者，一种矛盾也。毛主席深通矛盾之理，写出了《矛盾论》。因而他便掌握着阶级分合变化诸规律，善为运用于社会一切实际问题，推动着阶级形势如他所需要的那样去发展，于是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达于最后之成功。我于主席的《矛盾论》今天还讲解不好，口说阶级，其实没有懂阶级，实其一事无成。

然而追问我为什么竟至不懂阶级呢？只为我头脑拙笨吗，还是心有所蔽呢？大概兼而有之。这就是蔽于自己的阶级处境和感情了。自己的处境，缺乏在阶级问题上直接地深刻感受，是其所以不大懂阶级的一面；另一面则自己总还是统治阶级中人，从感情上蒙蔽着自己，不加体察理会。高谈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感情不足以副之——缺乏真实革命感情（当然就谈不到革命行动）。

今天自己想来革命，革命是谈不上，甚且不自觉地早落于反革命去。但我一生不贪安逸，不图享受，为国难而奔走四方，甚且抗战时跟着游击队昼

伏夜行于荒野山沟，颇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样子，究竟是怎么一股劲儿在支配着我呢？静心反省，虽则衷怀有爱国感情（对祖国的责任感），却夹杂着意气自雄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远非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

毛主席说过过去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当时听了很不服，及至事后明白过来，就晓得是指我一向反革命的言论思想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当时听了只是冷笑不服。及至事后明白过来，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方合乎主席纪念白求恩文中“一个纯粹的人”那句话。夹杂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至如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的；那自然就是说我这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亦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吧。

我的思想改造，首先应当消除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感情思想只能出自剥削阶级），并学习《矛盾论》，学会运用辩证唯物观点去看问题，避免重蹈唯心旧习。



## 八、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2005年4月，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找我谈梁漱溟，起因是他们看了我在2004年初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梁漱溟问答录》，颇感兴趣，硬是数次打电话到美国把我召回。他们的工作很认真，不仅听我讲，而且要我找出三四十年前的工作记录本和各种散件材料、照片、墨迹等，一一拍照摄影。我虽然颇为辛劳，却在翻找中新发现自己保留的资料中，还有一



◎儒学大师梁漱溟

一些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例如，我找到了这篇梁漱溟1965年7月10日在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发言。当时，我是记录人员，是亲身经历者之一。岁月无情，当时的全国政协直属组几十名学习成员现在都已谢世，连我这位当年才二十多岁的小组秘书，也已年近古稀。如今看着这篇记录，不免感慨万分。由于梁漱溟其人其事，由于这篇发言的史料价值，本想

封笔的我，仍禁不住全文推出，并分段进行评述，让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深入了解这篇发言更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

### 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一段：

组长（笔者按：指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话很长，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只说一点，从曹老（笔者按：指曹谷冰，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原《大公报》老报人）的话开头。曹老上次说，1949年在上海已有“听和跟”的话（笔者按：全文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50年代后期增加了“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当时他就接受了。我比不上曹老，笨得很，至1950年还不能承认这个话。记得是1950年劳动节（笔者按：或国庆节），那时候我在天安门城楼，不像现在在观礼台（笔者按：梁漱溟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顶撞闹翻之前，重大节日庆祝均站在天安门城楼，而后即降为观礼台——此待遇一直延续到1988年梁漱溟病逝），主席、总理都在我们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旗，旗中间写的一行字是：“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同年6月，为通过土改法开会，开了一星期，我偶尔在小组会上讲几句，大会上一直没有发言。有几位朋友关心我，如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诸人，说我不应该不发言。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大家说的话都是向领导颂扬一番，我觉得总说这样的话没有意思。自己不说这种话，朋友们关心我，指出不对，仍不以为然，可见自己的固执。当时领



导上还没有找我谈话。也是1950年，又开个什么会，头两天我没说话，总理通过徐冰要我发言，我才作了简单发言。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时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脾气。

### 述评之一：

请读者留意梁漱溟发言的第一句话，即“组长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这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十分平常。的确，在当时就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而言，大体上上半年暑假前，下半年年终，都要做学习小结，每人都不例外。问题是在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曾经集中几个月的时间，与梁漱溟“辩论”，即对梁漱溟进行大批判。如果别人是学习小结，而在梁漱溟身上则应该是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梁漱溟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大错，因此自己也是做“学习小结”，“谈谈自己的体会”而已。

那么，究竟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对梁漱溟批判了什么呢？这个大批判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在这里简述一下历史背景，这次批判梁漱溟，正是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20年间做政协直属组的学习秘书，而亲身经历的四次较大的批判之一。这些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了解梁漱溟的这篇发言，以至于进一步了解梁漱溟这个历史人物独特的一面。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因此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大会期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小会发言中都不免提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许多人都强

调政府各项成绩的取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抓了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梁漱溟对此不能苟同，又不好公开反对，便遵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冥思苦想地写了一篇发言稿，在政协第31组（梁漱溟大会期间所在的小组）小组会上作了发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认为政府工作成绩之所以显著乃至建国15年建设成就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科学之事、道德之事。梁漱溟在发言中阐述说，科学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民众顺应科学规律，道德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新道德教育了全国民众，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团结一致的新中国，等等。又作出结论说，正因为科学、道德这两桩事做得好，建国15年来才取得中国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成就。梁漱溟发言洋洋数千言，就是只字未提“阶级斗争”。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他自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而受到批判，长时期沉默后，首次在政协会议上较为系统地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立刻引起了与会领导和委员的注意。大会期间，即有与梁同组的委员指斥梁漱溟，说梁大谈什么“科学”、“道德”，一字不提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贩卖自己的私货。梁漱溟对此未作理会。等到大会临近闭幕那天，政协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讲话中提到当日书面发给大会每个委员的与梁漱溟同组的两位委员批判梁漱溟的联合发言，并予以肯定。梁漱溟坐不住了，当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指斥大会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不足以服人，要求答辩。次日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主席讲话，说有位委员提出答辩别的委员对他的批评，此事大会期间已来不及，可在大会结果后由政协学习委员会办理。于是，1965年上半年，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每周开会二三次，以梁漱溟所在的政协委员直属学习组（即政协直属组）为主，邀请平时不在该组的覃异之、黄启汉委员（即在政协大会上书面联合发言者）参加，全组总动员，与梁漱溟开展

“辩论”，由近及远，连同解放前梁漱溟著作中不赞同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的言论，都统统揭露出来，全方位地把梁漱溟的一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行”狠狠批判了一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没有检查自己，认错自责，仍然“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学习小结”，“谈谈自己的体会”。而更严重的是，他竟以“回顾”过去，自己“笨得很”为名，说什么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献锦旗，上写“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对此心里直摇头，等等。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了解，在1965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的时候，梁漱溟的这些言论是何等不合时宜，又怎能不使他再一次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

#### 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二段：

……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和脾气是怎么造成的呢？可能是生来的气质之偏，也可能是后天的习惯所成，或者是什么阶级什么的关系。对自己的过去也因为太多太长，只能略讲一二。记得八九岁时，就受到先父和长辈彭翼仲讲爱国维新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跟着彭先生在街上散传单，搞社会运动，内容如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号召抵制日货等。可见自己不是说说而已，还有实际行动。这是65年前的事了。当时的维新派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俗人的反抗，维新派有他的主张、见解，对流俗之见看不上，这些对我很有影响。还有，因为爱国，平日谈的总是国家在危难中，民生痛苦，讲的是大事情、大问题，不谈一身一家衣、食之事，彭先生为此将家当尽卖，甚至到年关上吊。我在14岁上旧五年制中学，毕业后即不想升

学，要搞革命，因为在中学时就参与革命。这时，家中长辈关心自己，以为不能尽搞这些，将来还要吃饭，也要为自己生计打算。但这话我已听不进去，不能为一身一家衣、食而苟生。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到吃饭问题。我的一生差不多没有职业，我虚岁19，遇上辛亥革命，转年20岁，又忽然想出家，对人生怀疑，看到烦闷，以至否定人生；这时，佛家的思想最合于自己，我是先有自己的厌世思想而去读佛家的书，而不是先出家而后学佛。固先去维新。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从小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我受佛家的思想影响很大。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我对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这一点，他无所贪恋，无所惧怕，什么也不顾。去年关于邹秉文的事，小组中大家都批评他，我虽也批评他，但和大家不一样，我肯定邹有51%是正确的，这是我不顾一切的一种表现。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职业。辛亥革命后，办过报社，当新闻记者，与曹老（谷冰）同行；因为信佛，不久又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好像与向老（笔者按：向达，政协直属组成员，北大历史系教授）同行；后来又办教育，任校长、院长，好像与李老（笔者按：

發願文  
我今在佛前頂禮  
披瀝心作懺悔  
無始以來貪瞋痴  
身語意業罪垢重  
或有覆藏不覆藏

李建勋，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教育家）同行，实际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的职业。我这种自信，自大，不愿跟别人走，不受外来影响的性格，好的一面是不盲从，能独立思考；另一方面是固执，常常误事，不能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我都看不对，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没有先见之明。我以前是不走共产党的道路的。李大钊先生是革命前辈，他与我个人关系密切，他给我介绍过三个朋友，在座的于树老（树德）是其中的一个，都是他介绍的。其他二位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李大钊先生从未提出要我加入党，他知道我这个人自信得厉害，说是说不通的，除非自己转过来。到今天我才明白，解决中国道路问题的究竟是谁？那时候认为只有我能解决中国问题，现在看来真是笑话。还可以举些例子。对蒋介石，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发起民主同盟，就是为了反蒋，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至1949年，南京城下（笔者按：指解放），蒋不得不引退，国民党一方发出呼吁，要求和平。我当时在重庆，曾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敬告共产党》，一篇是《敬告国民党》，意思是要共产党不要打下去，同时批评孙科不接受和谈条件。这前一篇文章惹了祸，引起很大误会，幸好自己事先声明“只言论，不行动”，甚至不为“和平”而奔走，而且我因此脱离民盟，表示不代表一个组织，只代表个人。现在想，这是不对的，只有消灭蒋介石，才有今天的中国。上次小组有人发言引到主席的话：“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主席这话很对，但当时自己不那么想，却认

为共产党打到底不对。我很感叹主席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反动势力对人民民主势力就是这样，蒋介石，美国，对我们都是这样；反过来，我们对他们，也应该这样。因为主席看透了这一点，该下手的时候就下手，所以手不软，很坚决，而我自己则看不透，总是喜欢折中、妥协、调和，心软手也软，这说明自己的性格、为人有短处，有弱点。抗美援朝时，徐冰同志要我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一个工作，我拒绝了，因为我对出兵朝鲜没有信心，当时主席还叫林伯老（笔者按：林伯渠）找我谈话。事后又证明，抗美援朝好得很，对得不能再对！而自己总是事后才明白，很迟钝。自己的见识这样不够，还要自以为是，显然是不行的。在这次学习中，自己也受益处，对自己有启发，使我真正懂得主席的这段话。我的话就到这里。

### 述评之二：

梁漱溟在这篇不长的发言中，蜻蜓点水般回顾自己过去如何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又检查自己何以如此，就是只字不提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全体同仁精心准备对他开展的那场大批判。何以自己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不赞同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错在哪里，他在1951年写作的长篇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发表于《光明日报》检查过自己。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的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纪录’了。固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动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言，



不苟同于人，即有好几十年于此；说思想转变这句话，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转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梁漱溟在长文中还特别强调：“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

梁漱溟以其特有的语言，认识到自己在旧中国一直认知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是错误的。何以到了1965年即离上述检讨自己的文章十多年以后，又挺身而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了呢？此事得摘录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漱溟生前在我撰写《梁漱溟问答录》中的话。梁漱溟对我说：“最使我惊喜的是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我想先摘录这一年9月27日在中共八大上通过的《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正是这个《决议》中的两段话，开拓了我的思想。”于是90高龄的梁老先生竟一字一句地对我宣读中共八大这个决议两段话的全文。其重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二是宣

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继续多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了解决中国今后的这个主要矛盾，党和人民则必须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即向大自然开战。梁漱溟在宣读这个决议时，竟兴奋地击掌大声说：“这两段话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

当然，梁漱溟同全国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一样，绝没有想到还不到一年时间，即1957年春夏之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由此而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1959年反“右倾”，1963年搞“四清”，等等，总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又成为主要的了。时至1965年，已接近十年“文革”的开端，许多人都响应号召，紧跟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走，真诚也好，随大流也好，自然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不能例外。正是由于梁漱溟这种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才牢牢守着中共八大决议所作出的决定，不认可新中国15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都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的结果。



©1987年10月，梁漱溟在“梁漱溟思想国际研讨会”上致谢辞。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一生言行的写照。他由此讲真话，不讲假话，行为上表现为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新中国成立后，自1953年9月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梁漱溟也因此做定了“反面教员”，极端的“顽固不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25年的时间，他不在乎对他开展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判，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诚然，真话不见得都对，更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梁漱溟先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坚持讲真话，只是表现一个人的品格，一种值得敬重的精神。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甚丰，身后出版的全集有千万言之巨。他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名人之一。但我以为，他留给后人影响最大的，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高尚的品格和精神。

## 九、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1966年6月，“文革”爆发。这场铺天盖地的风暴，使许多人晕头转向。林彪、江青之流的祸首除外。投机钻营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凡头脑清醒的，只能做一名少说话的旁观者。但都难免说一些违心之言。起而抗争者自然不乏其人，其后果或者投入冤狱，或者死于非命。身份特殊又历来敢讲真话的梁漱溟先生，在这历时十年的政治风暴中，处境如何？他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招来了哪些灾祸？笔者作为一名梁先生身边的亲身经历者，略记梁先生在十年动乱中几段重要的言论、行动，深信读者自然会联想到梁先生1953年秉直敢言的风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梁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因直言而遭受将近一年的批判之后作出的回答。

### 报载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之后

从1966年四五月份以来，梁漱溟先生所在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也由一周两次改为一周三次，加紧学习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无奈这个组的大多数成员，诸如于树德、王芸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爱新觉罗·溥仪、唐生明、秦德君等等，都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若与工农兵和干部及有

岗位的知识分子相比，可谓是局外之人。他们对于由批判“三家村”而开始的风风雨雨，自然无法理解，难以捉摸。虽然是一周三个半天的学习，大部分时间用于念文件，读报纸，常常是发言者寥寥，主持者深感为难，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是重复文件、报纸上的话，然后说一句“坚决拥护，要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时年74岁，是学习组里最年长者之一。他阅读文件、文章非常认真，不但在会场上，而且在家中加班加点，挑灯夜读，但始终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于树德先生与梁同岁，是梁交往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老朋友。他常常在大家都对“三家村”之类表态之后，恳切地问梁：“大家都发言了，梁先生有什么高见？可否说说？”梁总是摇摇头说：“我这人思路迟钝。请组长容我慢慢消化。”有人在私下对于组长说，梁某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动向值得注意。宽厚待人又深知梁之为人的于组长解释说：“学习发言是自觉自愿的，急不得，再等他一些时候吧。”

1966年6月1日，由《人民日报》开始，各报都在头版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霎时间，风雷滚滚，硝烟弥漫。这时候的政协直属组成员们心情更加紧张，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一连几次学习，只好埋头念报纸，有的文章甚至念了多遍。6月7日上午的学习会上，仍然无人发言。主持人发愁了，一连询问了几位，都婉言推辞。不料，梁先生这时却站起来了。于组长又惊又喜，连连说：“梁先生，欢迎您发言，您可以坐下来讲。”梁却说：“我这人有个老习惯，大凡讲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站着说。我身体好，就是站着讲几个小时也不会叫累的。”

他自己没笑，别人都笑了。

接着他开始发言。梁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几个月来，对时局的发展、变化，我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种事情发生。看到这种事心情是难过的。好比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是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国家肯定要受损失的。过去若干事情，我们这些局外之人不接触，不知道。聂元梓身居其中，要与对立面争斗，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只是不好过、困惑。我们不可能也做不到像聂元梓那样。也许在座的有比我前进的，但我说自己的心里话，怎样想就怎样说，我想有的朋友也可能有同感。

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笔者按：指彭真、刘仁等）统统不行，撤换了，而且还有其他若干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的。问题的症结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怎样解释？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后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报纸上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批判，亦不足以使人诚服。我一直在百思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之回答，已有些日子了。昨天我看《解放军报》的宣传教育要点中，有几句话很引起我的注意，似乎多少解答了我的部分疑问。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

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这“大个人主义”一词说得奥妙。我的理解，这大个人主义亦可称之为大个人英雄主义。我个人历史上就是很吃了这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亏的。独立思考，自有主见，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己看准了的，不管旁人职位高、势力众，也不改变自己的初衷。我因为这碰了大钉子，检讨时也以大个人英雄主义作分析。旁人不以为然，我却认为毛病就出在这里。如今对照“三家村”“四家店”的诸公，我以为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曾经在很长时间、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在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了许多事，甚至功劳卓著，但他终究没有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一步步走上与党相反的道路，也未可知。因此即便他曾经有过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现在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小功。我觉得，眼前发生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若干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梁漱溟先生这一席关于“九十九个小功比不上一个大过”的奇妙说法，在当时自然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指责。他们说梁漱溟是在“替反党分子开脱罪责”，又说“梁漱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多年来的反动立场决定了的”，要求对梁的“反动言论”开展批判。

但这一次并没有形成批梁热潮。这倒不是政协和统战部门有必要保护梁过关；对梁这样的名牌“反面教员”，是无论何时何地地进行各种名目的批判，也不为过的。问题仍在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发展神速，出人意料。梁漱溟这次发言后不多久，政协机关内部闹开了“文革”，“红卫兵小将”们紧接着又

杀向社会，查封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政协直属组也只得停止活动。

自此，梁漱溟先生只有坐在家中看书读报的份儿了。

## 红卫兵到梁家破“四旧”一幕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小将”们在天安门被光荣召见之后，一夜之间，中学红卫兵们首先杀向社会，名曰“破四旧”，实为“逆我者亡”，一切不顺眼、不称意的对象，统统以“革命”的名义格杀勿论。首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8月24日那天，风暴席卷到北京积水潭旁小铜井1号梁漱溟住宅。一阵来势汹汹的敲门声，使早有所闻的梁漱溟先生亲自去打开大门。一看，果然是许多中学生红卫兵。梁漱溟镇定了一下，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少来这一套，我们是来造反的！”

红卫兵们一拥而入，立即翻箱倒柜，搜遍每个角落。他们把梁家几代珍藏的图书、字画，除毛主席的书和马列原著之外，全部堆在院内，一边撕，一边烧。旧式的长袍、马褂及妇女服饰用品，自在撕毁焚烧之列。为烧得快，红卫兵们向火中倒花生油、豆油。梁漱溟夫人气不过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刻遭到罚跪和毒打，红卫兵们还边打边呼口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梁漱溟一直立在火堆旁，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图书化为灰烬。他深知此时此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早已成为一张废纸，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老伴的不满而招来的皮肉之苦，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只是当一名红卫兵要把两本大部头的《辞海》和《辞源》扔进火海时，梁漱溟禁不住劝说了一句：“同



学们，这是工具书，大字典，什么时候都用得着的。你们可以留着用，烧了可惜！”“放你的狗屁！我们红卫兵学习有一本《新华字典》足够用了，还用你娘的什么封资修的大字典！”听着红卫兵的臭骂，梁漱溟心中并没有暗笑，他的感觉是可悲、可怜。

烧完所有书画及被列为“四旧”的物品，领队的红卫兵发布命令：“第一，这里有电话，从今天起小铜井1号成为我们红卫兵的司令部；第二，梁漱溟夫妇两个老家伙住到南房小屋里去，每天打扫院内外的卫生，随时反省自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第三，从9月份开始，勒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只拿最低标准的生活费，不许继续吸人民的血汗，一个月拿几百元，过奢侈的生活。”

梁漱溟自然应承。梁家的小南房，历来是不住人的。阴暗、潮湿，且门窗不严。时为盛夏，因无纱窗，又不备蚊帐，梁漱溟夫妇当晚就被蚊虫袭击，彻夜难眠。红卫兵们占着大北房，门窗大敞，只见灯火通明，不时传来一阵阵笑闹声和电话铃声。老伴欲哭无泪，在破旧的木床上辗转反侧。梁漱溟第五次观看红卫兵“赐”用的破旧马蹄表，时针正指着凌晨三点整，他思索着这一天之间发生的剧变。书、火、皮鞭、红宝书、一群发了狂的娃儿。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的怪人、怪事，有几桩能与眼前的事相比？他从一本本化为灰烬的珍本图书、手稿、字画，想到几天前刚刚开笔的那篇题为《儒佛异同论》的长文。可惜啊，刚刚写成的一万余字文稿连同所有参考书、资料，被娃儿们从书桌上一卷，统统扔进了火堆。他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书籍毁了，别人兴许还有，至少北京图书馆不会遭此劫难吧。但这没有写完的论文，将来要重搞，怕不知何年何月了，而现在自己的脑子里还深深印着，主要的论点和资料都记得一清二楚。为什么不在这夜深人静之时，重新握笔

撰写呢？梁漱溟想到此，即从床上坐起，打开电灯，端端正正地坐到那张破旧的三屉桌前，铺开纸，落笔疾书。

从这天开始，连续二十来天，梁漱溟白天打扫院落、厕所，构思着他的《儒佛异同论》，以至于红卫兵们的不时诟谇，他也充耳不闻。入夜，他便一面挥扇驱赶蚊虫，一面潜心写作。待五万余字的论文完成时，红卫兵们因纷纷去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联”了，司令部自动撤销。但他并没有重返北房居住，街道干部又相中了这座小四合院。梁漱溟知道说也无用，便听调遣，告别多年的住宅，搬到次一等的房子居住去了。

红卫兵们所勒令的自动减低工资，还有一段小插曲。这事梁漱溟也是应承了的。他自己多年食素，如不购书，断绝一切交往，一个月老两口用不着几百元。他把红卫兵的勒令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全国政协财务科，果然9月份扣了工资，只发给几十元生活费。但到了第二个月（10月份），又发给了全月工资，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除的部分。问何以又不扣除了，答接上级通知。这上级又是谁呢？从报纸上看，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均属“打倒”之列，他们还有权限发什么通知？这个谜一直到1970年政协军代表短时间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时，梁漱溟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梁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等，不应扣发工资。梁漱溟对这条小道消息深信不疑。那时候，除了周总理，还有谁能体察到并关怀着他们那种度日如年的处境呢？

## 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政协停止一切工作活动，机关干部自己闹

“革命”，两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1968年6月开始军管，政协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凡属政协直接发工资而无实际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一部分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少数人在机关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干校，一部分在家待着。梁漱溟除受红卫兵冲击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在《儒佛异同论》之后，又着手《人心与人生》专著的撰写工作。

1970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那时的局面，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学习会的诸公原本是惊弓之鸟，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权利，谁还敢自不识相，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幾次，把“宪草”反复读了几遍，逐条逐句学习、讨论，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也深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是，他初读这部“宪草”，不当之处几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略说一二？他又想，“文革”进行四年多了，既无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为什么要放弃？风险兴许会有，但既是内部学习、讨论，

还能因为说几句话而犯下弥天大罪？他甚至想过，十多位知名人士开了好几天的会，提不出（实为不敢提）一条意见，就因为怕这怕那，实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让人家看着无肝胆、无骨气强。他决定冒险进言。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

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

梁漱溟先生发言结束，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组会上借提意见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用心何其毒也！还有人说：这种话要是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有的人建议，要在小组会上对这种反动言论进行消毒。梁漱溟对此一言不发。小组会主持人于树德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大家先作准备，问题听候处理。同时宣布：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谁负责。

这一闹腾，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办？他只有作好思想准备了。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于是，梁漱溟平安地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一定是周

总理办公室，就像“文革”之初不扣发工资的事情一样。梁漱溟心里是这样推测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第二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人大当时没有开成，“宪草”自然也流产了。

梁漱溟先生继续思索发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奇特现象。面对“批陈整风”、林彪之死，特别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批林批孔”的闹剧，梁漱溟忍无可忍，干脆“赤膊上阵”，单枪匹马地与江青之流对阵。梁漱溟以自己的言论、行动，写下了又一页震撼人心的历史。

## 在“批林批孔”中挺身抗争之前

1973年10月底，江青之流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经历了8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

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200人。他们也无例外地在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硬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

梁漱溟先生在近200名知名人士中，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个人与众不同，历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其他的。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两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

今天我們若輕率  
地貶低孔子或抬高  
孔子皆於他無所  
增損只是自己荒唐  
妄為我於批林聯系  
批孔還不明白不曉得  
寫此文是否有碍當前  
運動不敢公之於世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原文一九八六年  
四月廿日書贈  
江青林同志 梁漱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漱溟题赠本书作者的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批林批孔”发言内容的书法。

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做靶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颇感腻味，便心照不宣地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从听录音和贴的大字报中，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全体二十余人“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有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曾对人说：

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感到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

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许可，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好一番周折。

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厉声厉色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就在不几天之前，梁漱溟忍不住给北大某教授去信，责问他何以一巴掌推翻他自己多年来对儒学精心研究的所见所得？梁先生以为，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如他本人和北大某教授那样，则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

又过了若干天，在1973年12月14日学习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的催促下，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他衣冠整洁，神采照人，大皮包装得鼓鼓的。他站起来发言，先从皮包里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取出，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由于梁已是81岁高龄，主持者再次请他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讲了一个半天。

## 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

梁漱溟先生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半天，整理全文洋洋数万言。笔者当时是小组记录，现根据第一手材料，择结论性的要点摘登于后，以供今日的读者一开眼界。

梁漱溟在会上首先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



◎1987年10月，梁漱溟（中）在“梁漱溟思想国际研讨会”上与张岱年（左）等著名学者交谈。

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

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全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今天的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梁漱溟先生在长篇发言中，还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旁征博引，颇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典型的奴隶制度的问题。梁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初具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国有为数有限的家奴而没有成群而专事生产的奴隶；西周是封建社会，殷商也是封建社会，只是其完善的程度不同而已。梁漱溟说，持这种观

点的学者，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梁漱溟先生从这里把话锋一转，说：

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克己”且不说了，单说这“复礼”之“礼”吧。既然中国并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这“礼”又怎能是指奴隶主之“礼”呢？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据说还在卧室挂了起来，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问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

梁漱溟先生的上述长篇发言，犹如一闪迅猛异常的惊雷，划破了黑夜茫茫的长空！时值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政治闹剧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公开发表如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

这既是当天即刷出的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为时一年之久的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得老账新账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账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作了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彼此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然后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身不由己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比较安稳，上台演戏，照本宣读满纸违心之言的发言稿，就难得多了。因此在后来的一系列批判会上，有些民主党派的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

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台读批梁发言稿的事，最后只得由上边裁决，指定某人为发言人了事。

**“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

梁漱溟先生不赞同如此批孔的长篇发言，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政协直属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开始是猛攻，劈头盖脑，最高的调门，最大的帽子，应有尽有。接着是边批边追，要梁漱溟老实交代，全盘托出。本来，“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必然要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梁漱溟本不想再张口了，无奈众口追问，不表态过不了关。他想了又想，先露了个头，说：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与诸位不合拍，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容我不说更妥、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开场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全倒出来是过不了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紧迫之下吐出真言，把想说的话断断续续地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而大家则颇热衷于批判林彪的路线。这个问题，

得从何谓政治路线谈起。我自己分析，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拿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571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应该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

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了。《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一直是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逐步升级。开始时还限于梁漱溟所在的二十余人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后来便上升为一二百人参加的联组批判会，以加猛“批林批孔又批梁”的作战威力，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自1974年2月下旬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之



后，他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批判，不几日便主动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3月8日，即在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梁漱溟便在小组会上主动检查说：

最近我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东西，竟然拿出来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梁漱溟继续说：

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仁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了，真是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月11日，梁漱溟又在会上说：

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

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仁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的义务了。

从3月中旬以后，梁漱溟真的不申说了，但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批判会开了几十次，在众人一再追问他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他才断断续续地讲了前边摘录的那些话。

到了同年的9月23日，升级后的联组批判会告一段落，返回小组前，主持人一再征问梁漱溟对大家七八个月来批判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后却脱口而出：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这一年11月18日，梁漱溟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三月而四月，而五月、六月、七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八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各学习组均对我进行背靠背批判。预先宣布九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九月十三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仁。主持者要梁对自己的答复作出解

释，梁铿鏘有力地解释道：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先生的这段解释，使在座的同仁更加哑然、木然。会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说了几句诸如“顽固派不见棺材不落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之类的套话，调门很高、很大，却给人苍白无力的感觉。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从此，就没有人再与梁对阵了。

## 十、梁漱溟与赵朴初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

众所周知，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学习改造，不过是搞政治运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20年间，政协直属组的每个成员都有参加运动、改造自己的任务，因此人人都得表态，都得不断检查自己，甚至交代一些问题（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追查“政治谣言”）。但是，这个组的重点

人物是梁漱溟，仅仅是较长时间（几个月或半年以上）的对梁的大批判，就有三次。那么，作为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四个召集人（组长）之一，赵朴初对待批判梁漱溟，究竟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政治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哄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两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

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位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木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我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唯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但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次，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说，只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



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知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后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

“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岔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

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 70 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要出有才成。赵朴初听到此即打

梁林周书存念

林初

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赵朴初为梁漱溟像题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断我的话，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梁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去，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七八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即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

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程思远、启功、吴祖光、贾亦斌、沈醉等知名人士，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 十一、梁漱溟与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比梁漱溟先生小两岁，但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他是梁漱溟的学生，因而早年有师生之谊。多年来，他们之间一直有交往。解放后同在北京，直至“文革”中的1972年，梁漱溟还去北大冯友兰家中畅谈。自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之后，冯友兰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

文章，影响很大。梁漱溟对此十分不满，从此中断同冯友兰的联系，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责此事。直至1986年6月间，梁漱溟还在致河北保定友人袁鸿寿先生的信中责叱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为。信的全文如下：

虹叟足下：来函附件并收到。冯芝生原为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学生，年纪与我相若。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他后由其幼女扶持来见我解释之。至于许

虹叟足下：来函附件并收到。冯芝生原为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学生，年纪与我相若。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他后由其幼女扶持来见我解释之。至于许於許室際時常就我訪問清未民初政局彼錄音後又寫成文章以傳擇要刊出似向台端有出京遠游閩粵之意幸祈行前過或一談專布敬叩  
台安！漱溟拜拜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三日

宝骅（笔者按：生前任民革《团结报》社社长）常就我访问清末民初政局，被录音后又写成文章，以备择要刊出。似闻台端有出京远游闽粤之意。幸所行前过我一谈。专布敬叩台安！

漱溟再拜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三日

在此之前的1985年12月初，冯友兰为其九十寿辰致信邀梁漱溟赴宴，梁拒绝，并在复信中首次直接表示了对他十余年前在“批林批孔”中的行为之不满。在冯友兰生日过后的1985年底，冯由其幼女陪同到梁家中拜访，当面叙谈并解释“批孔”之事。期间，冯又赠其新作《三松堂自序》，梁看到冯在自述中对“批孔”之事有“哗众取宠”等自省之词。由此，梁漱溟在晚年的最后岁月，对冯在“文革”中的“批孔”之错，心气才逐渐平和了一些。

回顾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于1974年进行“批林批孔又批梁”运动的一年时间内，特别在运动开始之初，有不少人在批判发言中举出冯友兰先生公开写文章“批孔”的行动为例，或对比，或责问，何以梁漱溟不向冯友兰学习？何以不及冯友兰，不能痛下决心“立新功”？梁漱溟对此在会上不作公开答复，通常情况下是摇摇头，甚至一笑置之。实在追得太紧，他也是一两句话顾左右而言他，从不作正面回答。人各有志，或各有所难，或各有所图，律己可以严而又严，要求别人则不可强求。梁漱溟不在批判会直接谈冯友兰的是非，这正是梁历来做人准则的一种表现。可以苛求自己，却不能苛求别人。在笔者与梁漱溟先生的长时期交往中，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

还应该补充的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从1973年底开始，除了在会上传达中央文件、首长讲话，还宣读过许多“两报一刊”的关于“批林批孔”的大文章。其中还特别宣读了冯友兰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甚至还直

接参加过若干多方联合组织的报告会、座谈会，听一些“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讲话、发言。对此，梁漱溟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对有些追问，他也不作答复。但他在日记里，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不光是如前所述，至1986年6月还如是说，而且在当时就有许多文字记载可查。政协学习会宣读冯友兰的文章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读冯芝生论文两篇，可叹！”被指令（名为邀请）参加了座谈会，他更是不说话，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

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梁回信答复说：“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梁漱溟先生的态度是何等严峻，但在公开场合，却始终给冯友兰先生留足了“面子”。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在提供我参看的材料中还讲到过更生动的例子。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首次在北京大学登台讲授印度哲学，才24岁。其时，听课的学生中有许多人与梁年岁相若如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等人，冯友兰也是其中之一。1919年底，冯友兰赴美游学。1922年，梁漱溟先生轰动学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1922年冯读完梁的这本著作后，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给梁，等于是一篇书评。梁漱溟将此信保存了六十余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结束约两年之后，梁漱溟先生翻阅旧札，又检出冯友兰先生这封长信重读了一遍，看后不胜感慨，在信末空白处，写下这样一段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封信。芝生年岁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一九七三年春（笔者按：系1972年之误，其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久，梁、冯二老兴奋相聚畅谈，1972年1月9日梁的日记中有记载），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

“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笔者按：梁记忆有误，应为隔年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印）

好一个“批孔鸣于时”，好一个“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尽管梁与冯早年有师生之谊，而后凡七十年又同为中国当代新儒家之最，私交又相当密切，但作为一条只服真理而不服权势的硬汉，梁漱溟先生虽想起与冯友兰先生的多年交往和友情不禁感慨系之，却不能原谅这位老友在“批林批孔”运动那个非常时期的那种表现。即便是多年后冯友兰先生登门当面解释并著文（《三松堂自序》）自我反省，也不过是平了梁漱溟先生堵了多年的那口气，却不能让梁真正原谅冯友兰已铸成历史事实的过错。这就是为什么1986年6月梁老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还在说：“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

## 十二、梁漱溟的晚年生活

1988年6月23日，中国文化名人、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梁先生临终那天，笔者也在协和医院病榻旁。在他心脏发生停跳现象，医生着手紧急抢救时，他仍然头脑清晰，十分清楚地说：“我需要安静，需要休息。”据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介绍，梁老在病重时，曾不止一次地对领导说过：“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



◎美国女大学生娜娜十分崇敬梁漱溟。她不远万里，于2006年到山东邹平县寻访梁漱溟办乡村教育的旧迹。



◎1987年1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周策纵（左）与梁漱溟亲切交谈。

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在安静的心境中走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安详地辞别人世间的。

本来，人的衰老、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在今天，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社会、生活、医疗等）都比过去好得多，老人们要健康长寿却是完全能做得到的。不是说近些年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话，已经被“七十多来兮，八十不稀奇”所代替了吗？实际上，90岁以上的“望百”老人也越来越多，百岁老人同样比过去增加。这就是说，人要长生不老不可能，但要延缓衰老，老而健康，则不成问题。

梁漱溟先生以95岁高龄而终，而且一生道路坎坷，著作等身，尤其在90岁以后，仍然能生活自理，天天锻炼，用脑不息，甚至重登讲坛，著述不辍。笔者以为，对梁漱溟先生的晚年生活，特别是如何多少年如一日地修炼身心，对老年朋友们作一介绍，兴许会有借鉴作用的。



## 94 岁时被评为“健康老人”

我认识梁漱溟老人是在 1962 年。那时梁老虽然精瘦，且年居古稀，但精神抖擞，健步如飞，打起拳来腾空踢脚，一般中青年都不易攀比。他虽然有条件坐小卧车，却很少使用，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去书市、上公园。1966 年“文化大革命”骤起，他被中学红卫兵游斗二十多日，可身子骨未垮，不仅熬过了炎炎盛夏，而且夜晚还在蚊虫的侵袭中，藉灯伏案凭记忆撰写《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余字。1974 年江青演出“批林批孔”的政治闹剧，81 岁的梁漱溟老人毅然拍案而起，作两个半天计 8 小时的长篇发言，呼吁对孔子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一行动招来长达一年的批判斗争，他精力充沛，坚持场场奉陪。批判会中间休息时，他依然旁若无人，在政协礼堂的前厅练起拳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安定，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梁漱溟先生由八十跨进九十。他在当了三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搬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新居。老人的劲头更足了，除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接待若干海内外的来访者外，仍勤写不辍。梁先生还应若干海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不少是他的学生）之邀，在进入九十高龄之后担任中国文化书院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多次登上讲坛，给海内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讲授儒学、佛学和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老人能这样健康长寿，是不是自幼就底子厚，身子骨很棒呢？回答是否定的。梁先生小时候身体虚弱，好静不好动，经常生病，智力也差，老一辈曾以为他会夭折。梁先生出示一张 80 多年前的照片，风趣地说：“前

排正中坐者是我，实际年龄至少 10 岁，看上去却只有六七岁的模样。”梁先生回忆说，那时他已在新式的学堂读小学，也有各种体育活动，但因为身体差，胆子小，绝少参加。同班同学打篮球，他站在一旁看，就是没有勇气进球场。等别人打完了，他才一个人进场子抱着球拍几下，同学们却在场外叫唤他的绰号：“小老头，当心球炸了！”

梁漱溟老人的身体，是在过了青少年时期，特别是从中年往后，越来越好的。



©梁漱溟（前排居中者）与祖母、父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约在 1900 年）。

1986 年，有关团体评选梁漱溟为健康老人。对 90 岁以上的老人，主要标准是：生活上能自理，能单独行走；智力上能阅读，能交谈。梁漱溟先生超过了标准。他能读，还能写；他交谈自如，还能登台讲课。这一年，他 94 岁。

## 日本的“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

1986年末，梁先生忽然腰部疼痛难忍，坐立都困难。家人皆很焦急。我闻讯前去探望，心中也很担心：这么高龄的老人，身体再好恐怕也不易康复了吧。不料几个月的治疗、按摩、锻炼，老人家居然战胜了病魔，又能下床行走、活动，不久便恢复正常的读写，甚至应邀上讲堂讲课，到会发言了。

1987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到了梁先生家。当时约有9点钟光景吧，按梁先生的生活习惯，早饭后才不过一小时，但他已伏案看了好几封来信，并提笔给一位日本友人写好一封复信。看梁先生精神这么好，我高兴之余，随意问了一句这位日本友人是谁？梁先生没有多说，微笑着将来信和复信都递给我看。



◎晚年梁漱溟

原来，这位日本友人名叫和崎博文，是日本亚细亚问题研究会的代表理事，他的导师景嘉老先生与梁先生以文相交多年。和崎在来信中说，景嘉先生在半年前因病故去，其逝世一百天佛事在东京大增寺举行，场面庄重。景嘉先生生前翻译的梁先生新著《梁漱溟》（1984年在国内出版，已印刷了两次）日文本即将付印出书，景嘉先生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宇野正一为《人心与人生》所作的序文，业已校正完毕，并将由和崎先生本人补写日译本后序。这位日本友人在信中特别提到，遵照景嘉先生的遗嘱，日文版《人心与人生》一书所得版税，将与几位日本学者资助的基金合在一起，建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会”，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并作为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希望梁先生能够同意此举。

我再拜读梁先生的复信，全文如下：

和崎博文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正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先生为写日译本后序，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日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此乃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尚望先生早日来访问敝国。敬布复，并祝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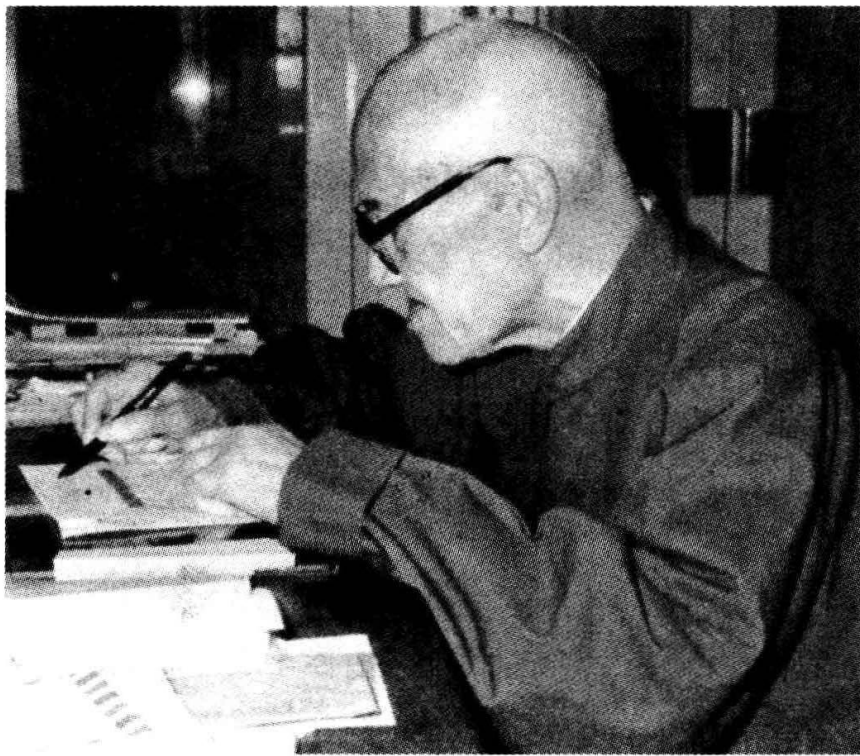
梁漱溟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接着，我又询问中国文化书院之事，并问梁先生是否还去参加活动？他

一面出示新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学报》（四开八版）让我看，一面缓缓地对我说：“中国文化书院是几年前由北京的一些学者、教授发起组织的，承蒙各位同行的信赖，推举我为该院的院务委员会主席，在我这种年纪，当然是挂挂名的。不过这个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个宗旨颇合我一贯的主张。我虽然年迈力衰，也曾几次去讲课。在今年5月5日举行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开学典礼上，我还应邀讲了话。据我所知，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数年来的教学、研究活动，的确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和学者的关切和重视。”

我正翻看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报》，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从外屋走进客厅，手拿着一叠《梁漱溟杂著选辑》书目和自序，请梁先生最后过目审定。我在一旁看着，对书名颇感兴趣，问培宽：“何谓杂著？”他答：“是家父自己定的。”梁先生听我发问，便又解释：“杂著是为着有别于我的《东西文化及



◎梁漱溟老人进入90岁  
高龄后仍然写作不辍

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专著而言。这本《杂著选辑》应三联书店之约而选，最早的文章写于1915年，最晚的写于1967年，时间的跨度有半个多世纪。全部文章由我自己初选，培宽代笔起草了自序。我今天过目审定后，便可送交出版社了。”

当我问到梁先生的著作在国内的出版情况时，梁先生笑着说：“《人心与人生》两三年前就出版了，已印刷了两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今年初已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今年内出版的还有《梁漱溟教育文集》、《东方学校概观》（文集）和《中国文化要义》（专著）。另外还有《我的努力和反省》、《忆往谈旧录》等书也即将出版。”

我问梁先生，最近有些什么想法和打算，他略沉思后说：“我的旧著新作在国内的出版发行，都是近几年的事，这使我感到欣慰。李商隐诗云：‘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止，思考不息’，只要我脑子还能用，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

我再一次惊异于梁先生清晰的思路，并感受到他那一贯积极、豁达的人生观。

## “情贵淡、气贵和”的养生之道

谈话后来转到老年人的养生之道。我说，“梁先生如此高龄，还能有这样健康的身体，不少人都打听您的养生之道，可否作一些简单介绍？”

“所言差矣！”梁漱溟先生接过我的话头说：“我如今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90岁之前，我坚持打太极拳，经常偕友或单独去公园休息，现在则大半在室内活动，每外出须偕同儿孙辈，独自都不敢出门了。当然，要说养生，我的经验可总结为：在生活上少吃多动，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气贵平和，情

贵淡泊。”

梁漱溟老人因崇佛学而素食，不沾烟、酒，自19岁时始，至今已坚持近80年；后来又因未曾真的出家，素食之外还加食牛奶、鸡蛋。但一切肉食荤腥仍一口不沾。再可口的饮食，也适可而止，吃七八成饱。多少年如一日这么做来，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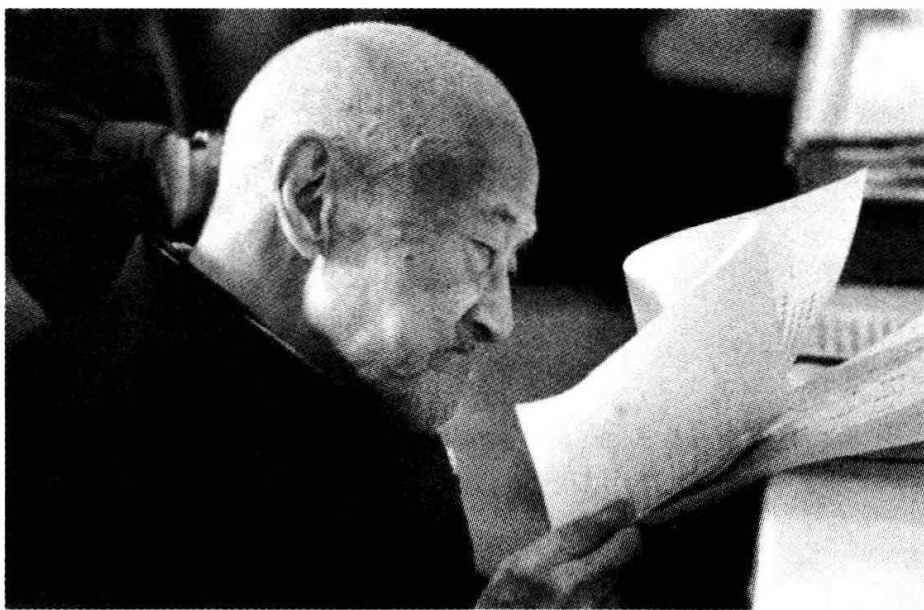
说到多动，即身体锻炼，梁先生天天早睡早起，定时运动，并持之以恒。他的主要运动方式是打拳和走路，每天早起和白天开会、写作、读书的间隙，都要运动多次。85岁以前，他经常出户锻炼，以后因年迈逐步减少出户运动。90岁以后，则主要在室内活动了。如今，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先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转动颈脖，然后吸气、呼气、屏气，50分钟后下床活动，每天在读书、写作的间隙，依然在室内散散步或打打拳。

去公园休息是梁先生多年的喜好和习惯。早在1919年春，他任教于北京



©1986年11月，梁漱溟在新居前打太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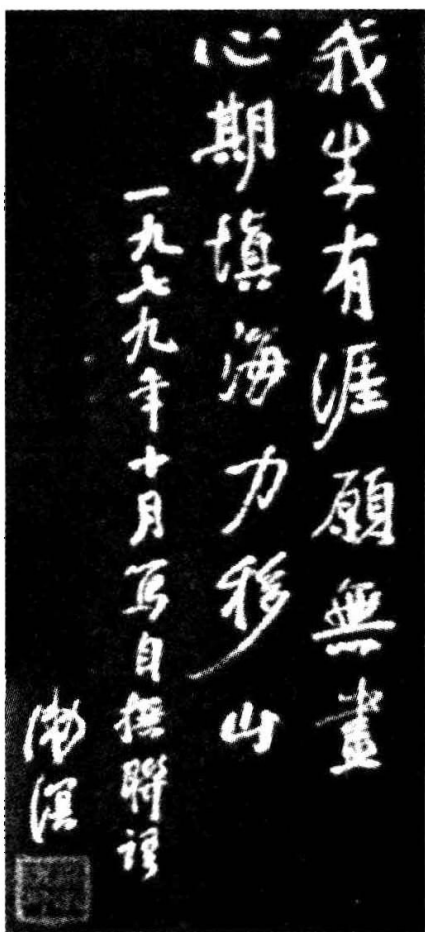
大学哲学系，与好友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同游北京中山公园并合影留念。可见他与北京各公园结缘已有70年之久。解放后几十年，梁先生经常一个人去公园，或漫步，或打拳。若遇多年不见的挚友，也常结伴而游。只是进入“望百”高龄之后，力不从心，外出须有家人陪同，才不得不断了这一爱好。梁先生不无遗憾地说：“人总是要老的，志趣可以不变，但体现这种志趣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得不加以变更。”



◎1988年4月，全国政协召开七届一次常委会，95岁的梁漱溟仍然赴会，并认真阅读会议文件。

至于人在精神上的“气贵平和”与“情贵淡泊”，意指遇事多思而有主见，受屈而不动气。这当然直接与多年修炼的品性、涵养相关，更非一天一日之功。梁漱溟老人从20世纪末进中西小学堂，开始明理世事，由自学而精通佛学、儒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种种磨炼。且不论其政治上的功过和事业的成败，单说他品格上的修身养性，却不能不为友人们称道。此前不久，梁漱溟老人曾写了两句赠友和自箴的话：“无我为大，有本不穷。”同时还写了一幅座右铭，曰：“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先生说：“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气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健康，





◎1979年10月写的自撰联：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  
海力移山。”

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

最后一条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他，越进入老年越要坚持多读、多想、多写的习惯。梁先生说：“活到老，学到老”，还应该加上“思考到老”。这话不仅对一个人思想上、事业上的前进十分重要，就是对保持身体健康，也很有意义。

熟知梁漱溟老人平时为人处世的人都知道，梁先生是言行一致地贯彻自己的主张的。

## 附录一：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病逝于1988年，以其95岁的高龄经历了56年的旧中国和39年的新中国。对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43年的经历，1988年7月梁漱溟病故时，由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梁漱溟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文化名人。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同“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和阶级对立，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漱溟先



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一直获得人们的称道。

在海内外学者评述和研究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功过是非时，更多地讲道：他从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7年，并出版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学创始人的基础；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前他的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践和理论；抗战之初他访问延安，而后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抗战后参加重庆旧政治协商会议，力促国共和谈；解放后他为国家、民族坦然建言立论，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委员，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却很少有人谈及梁漱溟先生青年时代参加京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的活动。笔者有幸在梁漱溟先生晚年的最后26年中与之交往颇深，并于80年代中期撰写、出版了《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两书，曾多次听到梁先生讲述他早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的往事，并于1986年辛亥革命75周年时就此对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专访。岁月无限，人生苦短。笔者整理发表这篇文章兴许能留点珍贵史料，有心的读者也会感兴趣的。

当1986年辛亥革命75周年纪念前夕，我登门拜访梁漱溟先生时，他已93岁高龄，但身体仍不错，尤其是对早年的往事更是出奇地记忆清晰，甚至连本末细节都能清楚记得。据说这是众多老年人的特点，近事忘得快，往事在眼前。我还记得，当我在梁先生的北京木樨地22号楼寓所落座，说明来意时，他竟一反平素好静的习性，显露出激动的神情，开口就对我说：

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创民国的了不起的举动，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大英雄。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是当时许多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的志向所在。辛亥年代我不过是一

名十八九岁的青年，但已为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忧虑、探索经年，辛亥革命之火也把我卷了进去。我个人做的事微不足道，但我所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却终生难忘，历历就在眼前，你就慢慢听我讲，最后再你问我答，加以补充。

下面就是梁漱溟向我谈他辛亥革命前后经历时我的记录。

## 因同窗好友甄元熙的影响和介绍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我于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

1910年暑假后，班里来了一位插班生，叫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后来才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是革命党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从广州辗转到北京进顺天中学堂，就是来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的。甄君比我长两岁，他因见我对时局也极为关心，很快同我成了好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是热心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上，我当时认为英国式政治最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并认为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式政体完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时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因为这，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聪明过人，自有一套交朋友的办法。一天，他悄悄交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商讨。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



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一边，当然不能立时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之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辩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总以他乐呵呵地主动休战而结束，从来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和友善态度所感动、所影响，观点渐渐有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看到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桩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可以说是形成了一股潮流，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政治改良。特别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9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性急的君主立宪派认为9年时间太长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很恼火，答复说：9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大失所望。因此清廷更加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士纷纷转向革命派。我看到这些事实，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因而革命便是改造中国的唯一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主要领

领导人。甄元熙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他见我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便及时主动介绍我加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时为辛亥年（1911年）夏秋之间。记得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剪了辫子。甄君在辛亥革命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转民国以后，他在京津创办《民国报》，自任社长，我在该报任记者。1919年、1920年间，甄君曾在广东大元帅府任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 京津同盟会活动点滴和彭家珍的壮烈牺牲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时是以小组织、小团体的规模进行，甚至单枪匹马地干。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步联络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就记不清楚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家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头卖货，后头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商谈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

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买过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那时，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灯具了。

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举动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一时震惊京内外，我这里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的情况。

约摸在辛亥年的腊月（笔者按：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几位先烈壮烈牺牲。消息传出，京津同盟会的会员们无不怒火满腔，东单三条聚会中，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



©1921年的梁漱溟（右），左为他的夫人黄靖贤。

擦掌。几天后（笔者按：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

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笔者按：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

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良弼那天，彭家珍身着清朝军官的服装，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清廷驻奉天将领恭顺（良弼好友）的名刺，声称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近，驶抵大门口，即传来一片“大人到”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家珍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显贵闻风丧胆，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授予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和碑竟不知去向，甚为可惜。

## 《民国报》的创办和担任该报记者时所见所闻

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是宣传同盟会主张的，创办者和编辑部人员大多是同盟会同仁。社长是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同志一同留学德国。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后常用笔名寿民或瘦民。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



新鲜的记得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一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表，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此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缺乏经费的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某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我在报社只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别看我当时只是个20岁的小青年，但顶着记者这个头衔，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可以说无处不去。我这段记者

生涯所涉猎的北京政坛见闻很多，现择其要列举一二。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辞，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8日晚，曹錕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

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越演越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800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特别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熔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熔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袁世凯资助、由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报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第二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

(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举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加之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终于使众议院落入右翼政党之手,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都是进步党人。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在国民党和进步党分别拟定的宪草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熊希龄总理副署解散了国会。

## 欢迎孙、黄莅临北京和聆听孙先生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民国建立以后,天真烂漫的同盟会会员们以为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了。于是便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议,意即革命成功,不必再用

“革命同盟会”这样的名称，而应成立宪政下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了。

梁先生说，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领导人莅临北京。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束，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由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

孙中山、黄兴到达北京时，许多在京的同盟会会员都前往欢迎，我也参加了。孙、黄两先生是在前门车站下的火车，袁世凯派了代表和欢迎人员在车站迎候，还有数目不少的保安人员。记得孙、黄步出车站后乘坐的是一辆铺黄缎子座位的新马车，当然这也是袁世凯让人先准备好的。由于在车站上迎候的有许多同盟会会员，当大家终于见着了崇敬的领袖，兴奋之情不可言喻，因此欢迎场面是相当热烈的。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

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会场上却发生了一起风波，正值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不在场。党章是以英国政党组织为模式制定的，而那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而同盟会则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为这一条，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提出质问，而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又一时无法答对。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以至于一哄而起，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不放，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先生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

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便先后发表演说。黄先生讲得很短，孙先生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先生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先生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作出了准确的统计。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牢牢盯在孙先生身旁，每当孙先生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先生的衣服，示意孙先生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因为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先生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当选为领导人者只有他一人是满票。这一改组，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别的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

在梁漱溟老先生讲完上述几件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之后，笔者又提问：你作为一名75年前的老同盟会会员，能否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说几句话？

他略作沉思，便笑着说：

75年前，我也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当时与我差不多的同龄人，后来经过种种磨炼，才逐渐成熟，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其中许多人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信念是爱国家、爱民族。有了这个基本而且不动摇的信念，才能谈及其他。如今是80年代了，情况虽大大不同，但爱国家、爱民族、爱科学、爱文化，树立信念，确立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这对于每个年轻人恐怕还是十分重要的。

## 附录二：蔡元培破格任用梁漱溟

1916年隆冬的一天，年仅23岁的梁漱溟带着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范任次长）的介绍信和他在今年上海《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主办）6、7、8期连载的长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去拜见刚刚走马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梁漱溟的心情是复杂且颇有点不安的。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曾祖父梁宝书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即举家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与1918年毕业班学生合影。（前排）右二：梁漱溟，右三：陈独秀，右四：蔡元培，右五：马叙伦。



京，几代在京津直隶做官。父亲梁巨川（名济）顺天乡试中举，官任四品内阁中书和内阁侍读，力主康、梁维新，受到变法失败的打击，辛亥革命胜利后更沉入苦闷，最后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宗旨，留下遗书，自投积水潭而死。

梁巨川的自杀曾在《新青年》杂志和其他报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梁漱溟也参与其中。梁漱溟极为尊敬父亲的学问和人品，其父亲人格力量影响着梁漱溟的一生。但少年梁漱溟并没有因此追随父亲的“殉清”之道，而在顺天中学堂毕业后的1911年，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毅然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梁漱溟进了《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及多数编辑、记者均为同盟会员、国民党人），以记者的身份参加当时北京的社会政治生活。

《民国报》改组后，梁漱溟赋闲在家，一头扎进佛学、哲学，简直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究元决疑论》得以在最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便是他奋发自学数年的成果。梁漱溟因此没有继续升学深造，论学历他只是一位标准的高中毕业生。

因为蔡元培是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民国报》外勤记者的梁漱溟，曾若干次见过蔡先生，自然是他认识蔡，而蔡并不记得他。又因为蔡元培自身是哲学家，梁漱溟一直沉醉于佛学、哲学，他又早就拜读过蔡先生的《哲学要领》等大作，可以说慕名久矣！更巧的是梁漱溟因他的舅舅张耀曾其时出任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梁和好友沈钧儒（衡山）一块儿给张耀曾当秘书，沈负责外勤，梁负责机要。梁漱溟以内阁司法部工作秘书的身份讨得教育总长范源廉的介绍信，前往刚刚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家中拜访。梁漱溟的动机，是想通过这次拜访，

得到蔡元培的当面教诲，自然也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深造。由于这些，当单独面见蔡元培的机会一旦到来时，梁漱溟有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寒暄之后，蔡元培翻看了一下介绍信和《东方杂志》，没等梁漱溟发问，仅仅正视了梁漱溟一眼，就开门见山地说：“好，你来得好。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路过上海时就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自己是搞哲学的，更要把哲学系办好。看了你的文章，我知道你潜心研究佛学，还旁及东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我是下决心要把各方面的哲学人才网罗到北大来的。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算一个人选。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我约你到北京大学再谈定，好吗？”梁漱溟听了这一席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发呆了好一阵子，才回答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担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我的本意，是来求教于蔡先生，希望能得到深造的机会。”梁漱溟的话还没有讲完，蔡元培便接过话头继续说：“今天我另有约，怕不能细谈了。我们只是先见一面，过几天再到学校细说，但我邀你来北大任教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考虑好再作决定。我的看法，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况且现在一切都在创建，万事开头难，不可求全。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青年梁漱溟性格内向，见蔡先生这么说，便起身告辞，感谢蔡先生的

盛情美意，答应回去再认真考虑。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来到北京大学校长室。在这里，梁漱溟首次与陈独秀相识。陈时任蔡元培新聘的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他也是应约来校长室的。蔡介绍梁与陈认识后，即问梁考虑好了没有？梁回答说：“蔡先生这样信任我，重用我，我怎能不识抬举，好意思不来就任呢？但我这人素来知一是一，知二是二，有关学问的事来不得半点不实。先生要我讲印度哲学，但据我所知，无论是西欧或是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我自己仅仅是对佛学兴趣甚浓，而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所知有限。因此总担心，难以胜任。”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



©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留影

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再说，你爱好哲学，我也爱好哲学，还有其他不少朋友爱好哲学，爱好别的学科。我蔡某人这次上任办大学，就是要将所有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并不熟悉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求得发展，你怎么可以

不参加呢？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也博得在场的陈独秀的赞同。于是当场商定，蔡元培校长聘请梁漱溟先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由于梁漱溟一时分不开身，蔡先生还同意课程由许季上先生暂代，到1917年秋天梁漱溟才正式进了北京大学，自此至1924年离校，一待就是7年。

梁漱溟自然是竭尽全力教好课程，在教学中学习，在研究中深造。他的印度哲学课讲稿《印度哲学概论》（二十余万字）1919年即由商务印书馆成书初版发行，至1922年发行第三版。更大的发展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大环境下，独树一帜，转向儒家学说领域。1921年10月，梁漱溟新儒家学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演讲，陈政、罗常培记录，陈、罗后来均成为学者）正式出版，影响海内外，至1930年即发行第八版，198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是五四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

## 后 记

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首发我撰写的专访梁漱溟的文章《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算起，已整整27个年头了。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病逝至今，也已经过去了18个春夏秋冬。岁月飞逝，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了梁漱溟先生。本世纪以来，梁漱溟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者不断增多，各种著述陆续出版，而广大读者依旧热情不减，使这些著作的发行量足够保本，多数还有盈利可赚。这在当前众多的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常常由有关部门拨款补贴才得以出版的情况下，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原因何在？我以为这虽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其共同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是20世纪新儒家的开创者，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又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的独特的思想和学识，他的特立独行的坎坷的人生经历，他的一辈子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铮铮铁骨，是十分不同寻常的，也是若干同时代的知名人士所不可及的。

关于我本人二十多年来撰写梁漱溟传记作品的风风雨雨，不必重复细述。现在回顾，我首先是在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大力支持下，写成了《梁漱溟问答录》。先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而后梁先生本人写序，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梁先生生前欣喜地看

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可惜未能目睹几年内即发行了近十万册的盛况。事隔1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2月又编辑、出版了新版《梁漱溟问答录》，也印刷了两次，发行量已达15000册。到了去年7月间，香港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主持人，因为看到新版《梁漱溟问答录》而邀我做了一个专集，题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播出后反响依然十分强烈。

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05年为我结集出版了《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一书，而后再注意到我在1988年《梁漱溟问答录》首次出版发行的前后，直至2005年7月间为止，我还撰写、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梁漱溟思想和生平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史料比《梁漱溟问答录》有所增加，其中有几篇是去年香港凤凰台采访时翻箱倒柜查找原始材料新发现的。第二，所有文章都是以第三人称撰



◎20世纪80年代初，本书作者（左）在梁漱溟木樨地寓所采访梁漱溟。

写的，每篇文章都有一部分我对梁漱溟思想和生平之思考与述评。这部分内容，是在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梁漱溟问答录》中所没有的。提议我将新发现的原始材料结集为《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我同意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意见，精选出这些文章中的十余篇，结集出版《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现在呈献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面前。

梁漱溟之思想和生平的确不同寻常，但同时亦是复杂、曲折的，不容易一下子搞清来龙去脉。比如，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把解决“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据悉，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有位著名的学者在发言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提出要重视“三农”问题的是梁漱溟老先生，但众所周知，他当时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话是对的，但一细想，却并不完整。关于这场风波之始末，读者可参看本书收集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我要说的是，1953年梁漱溟何以在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会上提出要重视农民和农村（那时不叫“三农”）问题，这当然与梁漱溟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进行社会实践的历史有关。于是这个问题又引出了下列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梁漱溟当年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像30年前那样，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说成是反动的，反革命的，还是应当重新审视历史，对梁漱溟之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作一番认真的研究，看看究竟还有多少可取之处？窃以为，我们今天的态度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1953年的风波，更有问题的是另一面，即毛泽东何以完全不接受梁漱溟当时的意见、建议，而且把他一棍子打下去？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梁漱溟对毛泽东之不点名（指毛泽东之第一次讲话）之批判不服，坚

持要当众答辩，顶撞中伤了毛泽东的面子，而爆发了这场冲突。应当说，这里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中国要强兵富国，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发展重工业，首先要顾及的是工业建设（含城市建设）和工人利益，而实际上不可能也无力量顾及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辽阔的农民和农村。又比如，为了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突出政权稳固和领导权问题，因而不允许梁漱溟发表这种有可能扭偏国家工业化大方向的“错误”意见，等等。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都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思想理论和社会背景的。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我以为，对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梁漱溟的一生，包括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实践，他的价值，仍有待于后人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是为本书的后记。

汪东林

2006年6月于北京



## 增订本后记

本书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在整理、写作此书过程中，翻选一篇篇散落在报章杂志和旧著中的稿件，不由得又一次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再一次缅怀起我曾经多年为他们服务过的梁漱溟、赵朴初、费孝通、程思远、孙起孟、雷洁琼等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我的心绪因此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我仅就梁漱溟先生一人多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辞世。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因工作关系与他结缘，长达20年每周在学习会上相处两三次。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冻结”多年的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得以“解冻”，我这个晚生的有心之人也以精心保存的百余本记录本为基础，敢为天下先，最早在报刊发表称道梁漱溟先生的文章。如果从1980年11月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算起，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没有准确统计，几十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关于梁漱溟的文章，数以百篇计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仅以专著而论，就有新旧版《梁漱溟问答录》（旧版15万字，1988年出版；新版27万字，2004年出版）、《梁漱溟与毛泽东》（自1989年初版至本世纪初共4个版本），而最新的一本，即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曾印刷两次。

坦率地说，旧版《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的时候，在国内不但

没有第二本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书，就是由美国汉学家艾恺撰写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在国内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正因为《梁漱溟问答录》的出版，而引发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内的数十家大小报刊发表评论拙作的文章，开始把有关梁漱溟先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逐渐公之于众，广为人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向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时间内，仅就国内而言，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专著，或评传，或传记，或儒学研究，或佛学探讨，已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著作我大体只是翻阅，有时还是经人推荐才知道的。总的说是件好事，从无人敢言，到众说纷纭，各种著述均有自己的特点，也免不了有充数其中的。但就我而言，所有著作凡引用1949年后梁漱溟先生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言论的，均注明出自汪某人的《梁漱溟问答录》或其他著作。仅此一点也可说明，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许多言论均被“冻结”而不为人知，而笔者因工作之缘，又确是有心之人，才得以保存了梁漱溟先生历时二十多年唯一政治舞台即以人民政协大小会议上直言的闪亮发光且有史料价值的言论。现在回想，我这个当年的记录员，或尊称为学习小组的秘书，还真的在1979年之后，为梁漱溟先生立传做了许多有益于澄清若干重要史实的事情。

现在再回到这本《“反面教员”梁漱溟》上来。我要向读者着重推介的是，这次新增的数篇文章中，第五篇是17000字的《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所谓文如其人，梁漱溟先生一生坚守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风骨再一次得到印证。至于《梁漱溟与赵朴初》、《梁漱溟与冯友兰》等数千字的短篇，则勾画出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的友情、交往和纠葛，相信

读者看着也会有趣味的。特别是作为本书《代序》的费孝通先生的仅有1400字的《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短文，可以说字字千钧，对梁漱溟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品质和人格魅力作了高度评价。应当指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是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面对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千余位学者、教授、大学生和新闻界人士讲的，说者和听者都肃然起敬，笔者是现场目睹者之一。是的，梁漱溟和费孝通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又是知名的学者。他们互相敬重，心心相通，是自然而然的。笔者有幸同他们二位多年相交相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写到此，悲从心生。我真的深深地怀念他们，毕生忘不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忘不掉他们的崇高品德，忘不掉他们的尊贵人格……

汪东林

2011年7月31日 写于灯下